

追隨聖保祿的足跡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在香港

一八四八年至一九九八年



申頌詩修女著

Sr Josefina Santos

馮彩華修女譯

取自

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

學術研討會
會議文獻

天主教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
二零零九

目錄

1.	由樂維威至沙爾德	1
2.	傳教旅程	3
3.	香港的傳教工作	5
4.	拯救棄嬰	11
5.	教育使命	14
6.	「喜樂之家」	17
7.	本地聖召	20
8.	走出灣仔	21
9.	新的服務中心	24
10.	基督君王堂	31
11.	邁向九龍	35
12.	戰事年代	38
13.	戰後重建	42
14.	新的氣息	46
15.	歷史里程碑	49
16.	銅鑼灣的變更	56
17.	不明朗的明天	61
18.	喜慶之年	63
19.	海外的發展	67
	附錄	69
	參考書目	70

第一章

由樂維威至沙爾德

十七世紀，法國已躋身歐洲強國之列，無論在軍備、政治及文化方面的成就，都處於優越和顯赫的地位。然而，法皇路易十四世（King Louis XIV）因昂貴的戰爭、奢華的宮殿，花費耗大；適逢天災、嚴冬、瘟疫及農作物失收，引發饑荒，低下階層須面對嚴重的民生及經濟困境，這情況延伸至下一世紀。以慈善救濟工作而著名的聖文生·德保（St Vincent de Paul），在十八世紀初也因而創立了「仁愛女修會」（Daughters of Charity），為幫助陷於貧困艱辛的貧苦大眾。

一六九三年，法國經歷了一場浩大的饑荒，不幸而死去的人高達二百萬。就在此時，一六九四年，一位年約三十歲的年青神父，抵達樂維威村·迺桑里堂區（Levesville La Chenard）。這條小村位於沙爾德（Chartres）東南約十五里，人口不超過一百五十人。沙路易神父（Fr. Louis Chauvet）對基督的福音懷著深切的熱愛，更深受聖保祿的說話所催迫：「對一切人，我就成為一切，為的是總要救些人。」（格林多前書：九章，二十二節）沙神父立即展開行動，決心要把他窮苦的教友，從貧窮的禍害中救出，更重要的，是要幫助他們脫離無知。他深知這不是他個人能力所及，必須別人的幫忙。

沙神父尋找的是善良、充滿宗教熱忱的女性，不管來自什麼階層、也不計是貧或富。她們只需天賦勤勞，因為她們將誓許委身基督，追隨祂仁愛的榜樣，以探訪窮人、病弱及教育小孩為她們唯一的生活理想。¹

很快地，兩位年青的女子及一位女士，雀躍地表示願意跟隨沙神父，把她們的生命奉獻給天主，為服役人群，特別是那些有需要的人。她們都非常慷慨、勇敢和無私。最初，她們都住在家中，直至一七〇〇年，沙神父在鄰近聖堂為她們所蓋的房子落成。沙神父更為她們定下了簡單的會規，並揀選了十七歲的瑪麗·米素（Marie Micheau）為院長。² 村中一位熱忱的貴族女士迪瑪利·安娜（Marie Anne de Tilly）協助他。沙神父指導她們的神修生活，培育她們，引領她們開

¹ Rene Gobillot, *The Sisters of Saint Paul of Chartres*, trans (Manila: 1956), p. 5

² 狄路易神父，根據他的札記，《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歷史的起源》，中譯本（1986），頁 115。

始她們的使命：教育無知的村童、探訪村民及病弱者。

沙神父起初的意願是組成一宗教團體，沒想到創立一有規模的修會，他所關懷的是他堂區內貧窮的教友。但在天主奧祕的眷顧下，這弱小的團體成爲了一顆種子，且茁壯成長爲一棵大樹。

巴斯卦（Paschal）的精神（經歷死亡而進入生命）及以基督爲中心成爲修會的神修特徵，這也是源自天主明智的安排。修會初期飽歷巴斯卦的奧跡；一七〇二年，第一位院長瑪麗·米素不幸死去，這迫使迪瑪利·安娜女士冒著家人頑強的反對仍離開家庭，追隨她熱愛奉獻於基督的聖召。可是，一年後，她也隨著瑪麗·米素而逝世。

一七〇八年，這被稱爲「樂維威學校的女兒」(Daughters of the School of Levesville) 的新生團體，已向週遭的村落發展。沙爾德（Chartres）的保祿·葛德·馬列主教（Mgr Paul Godet des Marais）也在這時接管了她們，並把自己的名字給予她們，把她們正式命名爲「聖保祿修女」（Sisters of St. Paul）。這也真是上主意願的顯示，清晰地指出修會將來的發展方向，就是如聖保祿一樣，成爲傳教士。

修女們搬遷至沙爾德不久，死亡再次襲擊這個新創立的修會；沙爾德主教於一七〇九年去世，翌年，創立她們的摯愛會祖沙路易神父也相繼英年早逝，只有四十六歲。

憑著對復活主基督的信德及摯愛，這個團體才能在重重的逆境中掙扎求存。充滿血腥暴力的法國大革命，摧毀了法國所有的修道團體，我們的修會也於一七九二年至一八〇三年被解散，但卻未能熄滅修女們的心火，或減弱她們的意志，她們堅守理想，決意跟隨耶穌基督，向每一個人宣揚祂的愛。

修女們退居至她們的家人或親友家中，改穿便服，仍繼續教育兒童、探訪和照顧那些病弱的窮人。³

³ James B Reuter, *For the Young At Heart : highlight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Manila: 1965), p. 19

第二章

傳教旅程

一七二七年是修會歷程的一個轉捩點，修女們的慷慨、勇毅精神和傳教熱忱都受到重大的考驗。這一年，歷史尚短的修會踏出了實踐傳教使命的第一步。從眾多的志願者中，揀選了四位勇敢的年青修女，開始一百二十天的航程，向著那陌生之地，遠在南美洲的嘉應（Cayenne）、法屬圭亞那（French Guiana）進發，在這些殖民地上居住的，是被法國政府遞解出境的戰俘、囚犯。在那時，派遣女性傳教士往外地是嶄新的嘗試，在法國，聖保祿修會是第三個派遣修女往遠地傳教的女修會，比她們早的，是一六三九年派修女前往加拿大。⁴ 如此，這寂寂無名的修會進入了兩處最重要的傳教地，第一是新大陸的美洲，第二是古舊世界的中國。奇妙地，日後證明，古舊世界的旅程是更顯著和結出更大的果實。

一七七〇年，修女被派往非洲海岸的毛里裘斯（Mauritius）及聯合島（Reunion Islands）。一八四八年，首次往海外傳教後約一百年，修會開始了第二次重要的海外傳教工作。其間，修會亦有在其他方面發展；一七三四年，由沙爾德誕生了兩株新的嫩苗，一株在亞撒爾（Alsace）的薩士堡（Strasbourg）成立，另一株於一八四六年在英國成立。在薩士堡成立的修會，更相繼在荷蘭、奧地利、南斯拉夫、巴爾幹（Balkans）、甚而美國，開枝散葉，成立獨立的修會。可見，在樂維威成長，不顯眼的小樹苗，繁衍成一個美麗的國際「花園」。

一八四六年，巴黎外方傳教會（Society of Foreign Missions of Paris）會士狄奧多·奧斯定·科嘉神父（Fr Theodore-Augustin Forcade），被委任為日本宗座代牧（Vicar Apostolic）及領銜薩摩士教區主教（Titular Bishop of Samos）。在等待日本開放門戶給外籍傳教士進入時，一八四七年十月，科嘉主教再被委任為香港宗座代監牧（Pro-Prefect Apostolic）。

⁴ Gobillot, p. 45



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狄奧多·奧斯定·科嘉主教

其後他返回巴黎，心中卻縈牽著他那新的使命。香港需要修女的幫助，他決定不會獨自回去。一八四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他寫信給與他最熟悉的修會，他的妹妹更是那修會的修女。

如所週知，香港島距離廣州只有數哩之遙，目前香港居民，除了管理政府的英人之外，還有華人以及來自淪陷城市澳門的葡籍移民的後裔。駐守香港的愛爾蘭官兵，幾乎全是教友。在華人方面，至少已有一個教友的小團體，而且大有與日俱增之勢，只希望它能夠在三數年間大事擴展。

愛爾蘭的官兵醫院，正需要有修女協助管理。官兵的女兒也很需要修女辦學施教…修女的學校成立以後，可以收容澳門的葡萄牙女童…。

最後，目前有一間以前成立的醫院，正在照顧從街上拾回來的華人棄嬰…都急需修女的幫助。

還有，愚見認為，香港甚至需要有修女以其修會的幫助來訓練華人青年，好使他們日後能夠承擔管理醫院和學校的責任，為同胞服務。⁵

回應是迅速的。被派遣的修女數目雖未能達到他的要求，但也能暫時應付目前的工作。

⁵ Jean Vaud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中國傳教簡史 一八四八年 - 一九二六年》，中譯本（香港：1980），頁2。

第三章

香港的傳教工作

科嘉主教帶著四位傳教士回到香港，她們是：奧古斯·嘉萊修女（Sr Auguste Gallois）、佳播·祖賓修女（Sr Gabrielle Joubin）、雷絲·莫斯修女（Sr Louise Morse）——她是一位英籍的歸依者，最後是主教的親妹妹雅芳善（Sr Alphonsine）修女，她從傳教地瓜德羅普（Guadaloupe）被召回，且被任命為院長。歷經四個月海上的危險旅程，她們最終於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踏足香港的海岸。

那時，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才剛七年，不但居住的衛生環境惡劣，且貧瘠得很，甚麼也缺乏。修女們初被安頓在灣仔（Wanchai）山邊一「茅寮」，這地點在前天主教墳場外，也是政府發給天主教會的第二塊地，第一塊在中區。七個月後，在同區靠近堂區的地方，為修女們找到較佳的居處。

香港的天氣及居住環境，與法國的有著很大的分別，首批抵港的修女生活艱苦，沉重的工作及壓力使修女們的健康響起了警鐘。兩年後，飽受工作疲累的雅芳善·科嘉修女（Sr Alphonsine Forcade），於一八五〇年十月，竟罹患腦炎而去世，享年只三十七歲。她悲哀的兄長科嘉主教稱她為「愛德的殉道者」。然而，好像這祭獻還未足夠，芳齡只有三十三歲的佳播·祖賓修女，也於三星期後相繼去世。第一粒種子已被撒播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猶如將茁壯成為大樹的麥子。雅芳善修女及佳播修女為天主及中國人民獻出了她們的生命，無可置疑地，她們的生命必孕育出新生命！

兩位初期傳教修女的去世，對在香港的傳教工作打擊很大，卻未能減退修女們勇往直前的心。幸好，在沙爾德的長上們已準備給予增援，同年三月，三位修女抵達香港，其中一位是聖瑪素修女（Sr Ste Marcelle），她代替雅芳善修女，成為新院長。

她們首先從事的工作是拯救被遺棄的嬰兒。很快，她們的房子已不敷應用。為了收納更多的兒童，於一八五一年，科嘉主教在離開香港前，為修女們在皇后大道東（Queen's Road East）獲得一較大的房舍。

那時候，那兒已有「兩座英式住宅」了，⁶ 聖瑪素修女這樣形容它。

房子就好像是特別為我們而蓋似的，地點位於海邊。裡面有一個小聖堂，此外還有聚會廳，寢室，為鎮內幾位女士教授法文的課室，宿舍，飯堂和為男孩子而設的教室。在另一邊的建築物，則有宿舍，飯堂及女孩子的教室等等。新修院裡設備完善。⁷

初期，社會對修女們並不友好，對外籍人士更懷有惡意。憑藉修女們鍥而不捨的精神，四出尋找棄嬰並細心加以照顧，終於贏得華人的信任，他們對基督徒溫婉的愛德並不是無動於衷的。一位院長於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給沙爾德寫了一封信，內容提及一名華人麵飽師企圖毒害外籍人士團體的社會情況，她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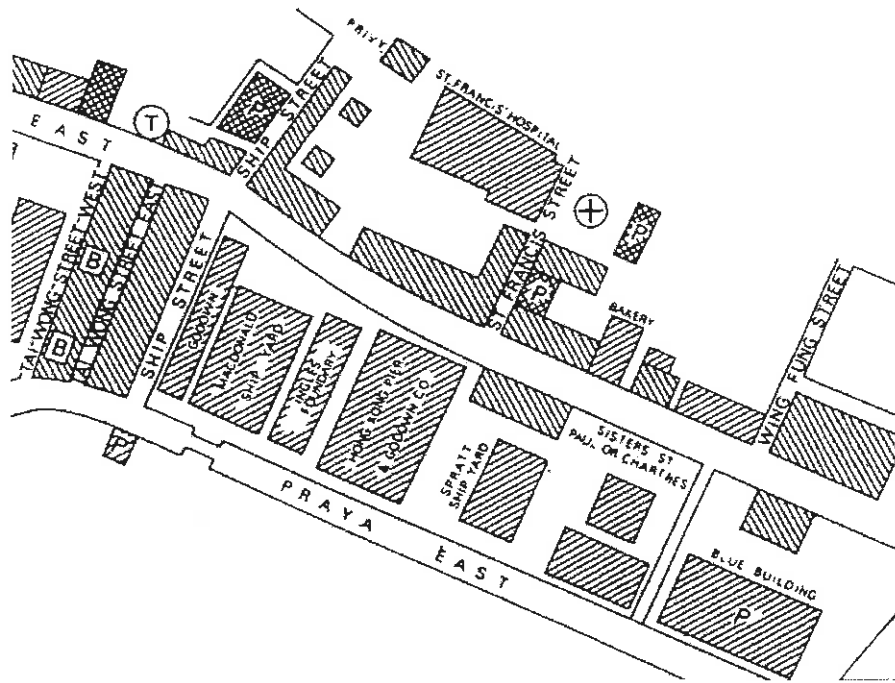
這裡的人都害怕中國人會趁外國軍隊不在（英國及法國軍隊）而乘機搶掠，縱火燒毀歐洲人所居住的城市，以及搶劫市內的居民等。我們只能把一切都交託天主的庇護，雖然我們認為中國人不會襲擊『聖童之家』（Holy Childhood），因為他們都清楚及讚許我們所做的工作。最近他們關閉商店，並且拒絕售賣東西給歐洲人達一兩日之久。可是，他們如常把供應品送到修院，讓我們不會因這次的風潮而受影響。雖然當時我們都被迫要付出較多的金錢購買食物及供應品。⁸

除了要應付工作上巨大的困擾外，修女們還要面對接踵而來的天災人禍，如傳染病、瘟疫、火災等。一八六三年爆發的霍亂肆虐最大，奪去了三位修女的性命。一八七八年，第一位華籍修女——戴本雅明修女（Sr Benjamin Dei），在灣仔的一場火災中喪失生命。

⁶ Carl T Smith, *A sense of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p. 121

⁷ Jean Vaud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中國傳教簡史 一八四八年 - 一九二六年》，中譯本(香港：1980)，頁 25。

⁸ 同上註，頁 40。



一九七二年灣仔地圖 顯示 23-24 地段 (Marine Lots)

較早前，修女們曾面對一沉重的十字架，受到威脅的不是她們的生命，而是修會在香港的存亡。若沒有天主仁慈的眷顧和協助，恐怕今天修女已不在香港了。裴神父 (Fr Feliciani) 重被委任接替科嘉主教，而他又被盎神父 (Fr Luigi Ambrosi) 所替代，於一八五五年成為宗座監牧 (Prefect Apostolic)。

科嘉主教離開香港之前，代法國「聖童之家」(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 從裴神父處購入海旁皇后大道東二十三及二十四地段 (Marine Lots 23 & 24)。由於聖童之家在香港不能擁有物業，因此就以聖保祿修會的名義購買該地，其中一個條件是：「修女倘因任何理由離開修院，該物業就改屬傳教團所有，而他們將按照修院所付出的買入價補償修院。」⁹

⁹ 同上註，頁 45。



首位省會長本雅明·諾爾·古斯修女
駐守越南西貢，同時管理香港及澳門

可惜的是，價錢沒有立即付清。當新院長本雅明·諾爾·古斯修女（Sr Benjamin le Noel de Groussy）於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抵港，接替雷絲修女（Sr Louise）時，便立即收到盎神父的通知，修女們須離開她們的房子。震驚之餘，修女不知事出何故，猜想盎神父意圖把法國的傳教工作與意大利的傳教工作合併為一，如此，修女的精神及物質生活，將全屬他的管轄之下。

本雅明修女堅拒遷出，因她須先獲得聖童之家的准許，他們才是真正的業權人，再者，她也須先取得沙爾德長上們的同意。他們的答覆需時，因為那時的通訊系統非常緩慢。然而，盎神父等不了。隨後的一個月，即一八五九年七月，他邀請了一個意大利修會到港，他希望她們取代聖保祿修女。六位嘉諾撒修女於一八六〇年抵港。¹⁰

盎神父要求修女們立即遷出，因為他已把房子賣給了一位名叫華西（Vacher）的瑞士人，盎神父深信他能把修女逐出住所；為達到目的，他用盡一切恐嚇的手腕，向修女施加壓力。修女們所能做的，就只有祈禱，及耐心等候羅馬的回音。期間，本雅明修女往澳門（Macau）尋找棲身之所，以防修女們真的不能在香港停留。

¹⁰ NM Clarke, *The governor's daughter takes the veil, Sister Aloysia Emily Bowring, Canossian Daughter of Charity*, (Hong Kong: Canossian Missions Historic Archives, 1980), pp. 111-114



左邊第三間是灣仔「聖童之家」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

久候的回音終於抵達。沙爾德主教類思·尤真·雷諾 (Mgr Louis-Eugene Regnault) 於一八六一年六月五日給她們寫信：

羅馬當局舉行了一連串會議，有關該等會議之結果，及我與傳信部總監 (Prefect of Propaganda)，巴拿甫樞機主教 (Cardinal Barnabo) 所達成之協議，現敬覆如下：

- 一、 院長及各修女皆獲准繼續在香港居留。
- 二、 院長可向宗座監牧盎神父再次提議，接受買賣合約中所釐定之款項，另加利息。¹¹

聖保祿修女在香港的一段痛苦又哀傷的經歷也就此而結束了。為修女們，結局仍是喜樂的，但為能繼續在香港服務人群，她們須付出昂貴的代價。約一年半之久，她們接連地被剝奪領受聖體聖事、參與感恩聖祭、保有聖體、甚而聖堂等權利，而這些都是她們神修力量和慰藉的唯一泉源。

幸而，祝福也隨著災禍而來。自此，修會在澳門及越南展開了新的發展。本雅明姆姆在她困難的日子，與越南商討開設一新的傳教站。一八六〇年五月十一日，她先派遣兩位修女前往，當香港的爭議完結後，她也跟著前去。本雅明修女在磨難中能保持堅毅不屈的精神，一八六一年，她被委任為西貢的首席院長，管轄範圍包括香港和澳門，對此新任務，她實在當之無愧。

對香港教會初期的發展，盎神父也有很大的貢獻。當他於一八六七年三月十日逝世時，天主教徒哀悼他，稱他「深受尊重和愛戴，並

¹¹ Jean Vaud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中國傳教簡史 一八四八年 - 一九二六年》，中譯本 (香港：1980)，頁 59-60。

為羊群付出他的生命。」跑馬地（Happy Valley）天主教墳場的小聖堂也是為紀念他而建。¹²

一八六七年，香港監牧區（Hong Kong Prefecture）交由宗座外方傳教會（PIME）負責管理。遺憾地，修女們與意大利籍的神職人員關係仍緊張，未如理想。修女們只能投靠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司鐸們，尋找指引及神修指導。不過，這些法籍神父偶爾也未敢給予意見或加以協助，恐防引致意大利監牧們的不悅。沒有了神職界的支援，很自然地，修女的宗徒工作也受到阻撓，五十年之久，她們的服務範圍仍只局限於灣仔區內。

一八九一年，保祿·十字姆姆（Mother Paul de la Croix）去世，由菲力斯·佐頓姆姆（Mother Felicie Jourdan）接任。在她長久的任期內，修會在香港完成了最重大的發展。她更被任命為第一位香港省會長。她較前任的院長們幸運，獲得和主教（Mgr Louis Piazzoli）的極力支持及援助，他待修女們如慈父一般。溫和聖善的和主教於一八九四年被委任為宗座代牧。無人不知道他對修女們的愛護，他身邊的人甚而稱他為「法國神父」。

他經常往灣仔探望沙爾德聖保祿會的修女。其時，修女在港服務已快五十年，數千名的嬰兒被她們從死亡邊緣中拯救出來，撫育教養，踏上新的生命。沒有別的工作比這個更使他感到喜悅，這是他心中的摯愛。¹³

和主教解除所有曾加給修女們的禁令，他對她們說：「繼續你們的善行吧！當你們未能遵守舊的禁令時，請告訴我，我會負起全部的責任。」¹⁴

¹² Thomas F Ryan, *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59), p. 44

¹³ 同上註，頁 110。

¹⁴ 同上註，頁 90。

第四章

拯救棄嬰

來自法國的首批修女，於一八四八年抵港後不久，便發現最刻不容緩的工作，是拯救和撫養被遺棄的嬰兒，且主要是女嬰。在那時的中國社會裡——包括香港，遺棄嬰兒，視他們不配祖先的名字，或是家庭的負累，是普遍及被接受的習俗。尤其是女嬰，她們被當作貨物般看待，可被棄掉、售賣、遺棄，亦可被拾起撫養，待長大後再賣給富裕人家作妹仔（mui tsai）或妾侍。更壞的是，大部份的女棄嬰常被收集並賣到妓院，價錢則視乎年齡及健康狀況而定，綁架或監禁女孩子也是常見的事。這些悲慘境況驅使修女們立即展開拯救棄嬰的行動，盡量把他們從惡運中救出。一位修女寫信給沙爾德的一位女恩主，講述她如何因這些可怕的行為而感到沮喪。

如今，我們可以這筆款項去購買一些年齡較大的女孩子了，她們的價錢較高，我們往往需多付數塊錢，這遠遠超越聖童之家的經濟能力。最使我們難受的，是深知大部份較年長的女孩子，將被賣到沒有信仰的人手中，而越是漂亮和健康的，更會被交到鴉母的手中。啊！但願我們有足夠的金錢，把她們全部買過來！

她雄偉的心渴望拯救的，不是數名，而是全部的女孩子！

面對販賣人口的邪惡陋習，在沒有法律保障這些不幸的兒童及少年的情況下，修女們開創的孤兒院，也是一實際的解決辦法。香港政府還要花費多年才定出律例，制訂妹仔陋習為不合法。

修女抵港後不足一個月，便開始收納第一名棄嬰，那是隨後數千名可憐棄嬰的首名，修女把他們從孤苦無靠，甚而面對死亡的命運中拯救出來。當修女收養，甚而購買棄嬰的消息傳開後，很快地，很多華籍基督徒也來參與這救靈的工作，而另一些人則為購買棄嬰的金錢所吸引，把棄嬰帶到修女面前。

修女的工作，經濟上是受到聖童之家機構的支援，那是法國主教嘉祿·霍賓·鄭信（Charles de Forbin Janson）於一八四三年為天主教兒童而創立的機構，中國無數幼小受害者的哭聲及悲慘命運，使主教深

受感動。他向法國的兒童呼籲，提議他們每月為援助中國兒童而祈禱，並作少許捐獻，他的呼籲受到熱烈的歡迎。這個獨特的「讓兒童幫助兒童」的構思，發展至整個世界，也使修女得以拯救數千兒童脫離悲苦，更重要的是他們沒有失落天堂。為表示對這機構的感謝，修女在香港的第一個機構也以此為名——「聖童之家」

(*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 - Home of the Holy Childhood*)。

修女的工作不斷增多，需要的經濟支援也越大。修女開始教授法文、售賣物品、籌款及出售孤兒的針織手工藝品等，以增加收入。

一八四九年末，修女共接收了二百二十六個兒童，他們大部份的狀況很壞，死亡率很高。一八五〇年至一八五五年間，平均死亡率是百分之六十八，而一八八〇年至一八八五年間，死亡率更增至百分之九十四。



「聖童之家」的孤兒、老弱、殘障 (二十世紀初期)

雖然大部份的兒童都死亡，能夠生還的，修女都給予他們終生的照顧，「由搖籃至墳墓」，修女細心教養他們。由於感到工作量超越了她們的能力，修女組織了一支由教友組成的支援隊伍——「十字架的愛護者」(*Lovers of the Cross*)。這些華籍貞女穿著特定的服飾，她們多來自香港及中國內陸良好的天主教家庭。¹⁵ 修女又聘用奶媽來照顧年幼的嬰兒。

當她們所照顧的兒童成長至適合的年齡時，傳教司鐸為她們物色對象，安排她們與天主教的男青年成婚。司鐸首先接觸聖童之家，而修女們再以她們的條件，篩選未來的新郎，看看是否適合作一理想的結婚伴侶。他的年齡必須是二十至三十歲之間，不可超過三十歲，必

¹⁵ Gobillot, pp83-84

要是熱誠的天主教徒及品格良好，且經濟充裕，有足夠的能力照顧一個家庭。

第五章

教育使命

修會起源的神恩是教育無知者，修女忠於這個精神，對她們所收養的兒童，不單提供住宿、衣物及日常所需，更籌畫他們的將來。相信修女於一八五一年左右，當她們已遷至靠近海旁較大的建築物時，已開始為孤兒們提供教育的服務。



上課中的孤兒

開始時，修女教導他們基本的讀寫能力、計算，當然還有宗教培育，後來更教導他們謀生的技能。起初，他們學習縫紉，為自己做衣裳；能力較高的，修女教導他們製造通花花邊、編織麻紗、刺繡等。當那些英國的女士們看到女童所製作的精美物品時，便立即訂購，這為聖童之家增添收入。



孤兒學習編織及縫紉

當修女於一八四八年抵港時，已有三所由監牧區開辦，專為中國

男、女兒童的小型學校，¹⁶ 但仍沒有為外籍兒童而設的學校。天主教家長憂慮他們子女未來的教育，懇求司鐸們，司鐸轉而催迫修女為他們開辦學校。

首批由法國來港的傳教修女中，其中一位是英國修女——雷絲·莫斯修女。在一八五〇年第一位院長逝世，及一八五六年第二位院長返回法國時，她便當上第三位院長。那年終結前，雷絲修女開設了一班級，取錄了十四名兒童，一八五七年五月時，已增加至二十四名。她這樣向沙爾德的長上們述說當時的情況：

我們沒有其他的選擇。那些意大利司鐸們已不能再忍耐了…，天主教的家長們認為修女抵港已有很長的時間，仍未能開班教學，對此感到很憤怒…。每天我與另一位修女前往，在不同的部門教授數小時。我們這兒沒有地方，而路途遙遠，不適合小朋友來往，所以我們不能在這兒教授…。

由於聖童之家沒有空間，莫修女有五個月之久，在附近租賃了一層樓房。

雷絲修女體力日漸衰退，於一八五九年返回法國，自此，這首次為女童開辦學校的嘗試也因而被擱淺。十七年後，一八七六年，保祿·十字·庇雅姆姆（Mother Paul de la Croix Biard）再次開辦一班級，取錄了十二名歐籍兒童。¹⁷ 無論是為孤兒或學生，或所做的任何事情，修女的目標，顯然不單只限於這個世界。一九一〇年出版的章程，清楚地列明這目的：「傳授給學生的…不單是良好的基礎教育，更要能使她們獲得永生。」¹⁸

位於灣仔的學校，距離維多利亞市（Victoria City）中心，仍算是「遙遠」。開埠初期，在城中行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平地走，主要的交通工具是人力車，往山上走則要靠轎子了。高主教（Bishop Raimondi）准許修女收納寄宿學生，但不得超過十二人；這禁制令於一八九五年為和主教所免除。

¹⁶ Sergio Ticozzi,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 1997), p. 21

¹⁷ Bord, Paul, *Mother Benjamin le Noel de Groussy*, trans. (np: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p. 101

¹⁸ *Hong Kong : 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 (Chateaudun : Societe Francaise de Phototypie, 1910), p.43

學校於一九〇二年轉為一補助學校，不斷努力提昇教學水準。一九一〇年底雅斯·羅柏修女（Sr Beatrice Roberts）抵港，她被任命為校長，隨而帶給學校一很大的推動力。她非常能幹，才能超卓，不斷精益求精，她務求學校達到優異的品質，提供優質教育；至今，學校仍保持著這質素。



灣仔英語學校學童（二十世紀初期）

學校的法文部於一九二六年關閉，但法文仍被保留為一科目，其他科目有音樂、美術、繪畫、縫紉、打字及速記。一九三七年底雅斯修女被調往菲律賓，兩年後返回香港，出任香港大學聖母女子宿舍（Our Lady's Hall）舍監。

第六章

「喜樂之家」

修女的仁愛工作逐漸延伸至援助人類不同的困苦及需要。孤兒院也酌量收容傷殘的人士，她們在聖童之家內另立一部門，稱為「仁濟之所」(Almshouse)，在那兒給予他們特殊的培訓，並教授他們學習一些技能，聾啞的人學習以一套香港特有的手語彼此溝通。修女教授他們縫紉，但更多的時間，他們從事家務，及協助修女照顧年幼的兒童。



修女們教授長者手工藝

至一八八〇年，聖童之家的房舍已日漸殘舊，且過於擠迫。擴充樓房是緊急的需要，保祿·十字修女立即向沙爾德母院訴說。

我們所熱愛的工作令我們欣慰萬分。一八七九年的一年內，我們收容了一千零六十二位兒童…我們或是加建宿舍，或是把一部份兒童送走。我已聽到你心內的答案了：建造更多的宿舍。事實上，我實在沒勇氣關起大門，把這些應該長在天國花園中的花朵摒諸門外。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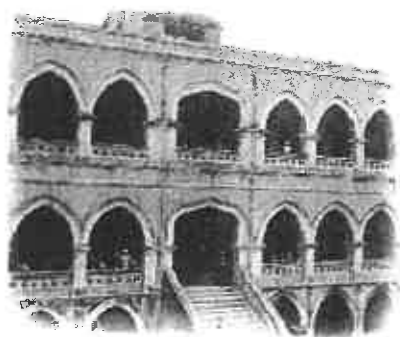
修女們一接到准許，立即採用各種的方法進行籌款——募捐、舉辦賣物會、義賣等。她們的努力沒有白費，籌得的款項足以興建一所比原有大一倍的房子，可收納途經香港往中國大陸的傳教神父、修女，及受到颱風、海難的受害者等。

¹⁹ Jean Vaud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中國傳教簡史 一八四八年 - 一九二六年》，中譯本（香港：1980），頁 94。

一八九四年，爆發了一場厲害的瘟疫，很多人變得一貧如洗，棄嬰的數目也驟然增加。不管怎樣，修女照顧的，不單是兒童；在這次流行疫症中，老年人也深受其害。

一天，一位年老的病婦，聽別人述說修女有無盡的愛心，心血來潮地跑到法國修院的聖童之家，單懇求一件事：就是「能進入喜樂之家」。房舍的空間已很狹隘，更重要的是已接收了大量的兒童，這些理由，足以驅使修女拒絕接收這位病婦；然而，院長修女好像只聽到仁愛之聲，「喜樂之家」(House of Happiness)的門，也隨之為這位病婦而打開。

很快地，更多的人跑來懇求收容，他們也受到同樣的歡迎。因此，隨著天主的指引，藉著修女不忍拒絕的心，一項新的愛德工作——照顧長者，便展開了。事實上，這項工作促成了另一項更龐大、要求更高，但也更長久的宗徒工作。



醫院於一八九八年啓幕 (二十世紀初期)

天主的旨意很快便顯而易見，修女需要開始一項新的服務。一八九四年，爆發了極具破壞性的淋巴腺鼠疫，修女即時作出反應，在毫無計畫下，開始了現有「聖保祿醫院」(St. Paul's Hospital)的工作。在灣仔這個「庇護之城」(City of Refuge)，已收容了很多居留者：棄嬰、孤兒、盲的、聾啞的、跛的及老弱的。他們很多都需要醫療及藥物的供應，建立一所醫院應是天主的旨意。聖童之家的空間已到了極限，接替保祿姆姆的菲力斯·佐頓姆姆，不用多想便提出建立一所醫院的請求。這所醫院在兩年後完成，於一八九八年一月一日正式啓幕，也就是人所通稱的「法國醫院」(French Hospital)。

院舍頂層曾被「美國聖母升天女修會」(American Assumption Sisters)作避難之所，她們因美國及菲律賓大戰而逃離菲律賓。首三層則為仁

濟之所及「育嬰院」(*Crèche /nursery*)，有三十六名老婦人居住，後更增至超過六十人，另有一間大房專為收容貧苦的兒童。三樓是手術室，設備完全符合最嚴謹的衛生條例；著名的德國籍醫生如加爾·猶迪醫生 (Dr Karl Justi)，他是醫療主管，奧斯加·梅利醫生 (Dr Oskar Muller) 等，都在這兒施行手術。那時，醫院沒有固定的收費制度，病人各按自己的經濟能力及心意付錢，如此，富人的慷慨補償窮人的不足。醫院旁附設藥房，每年約有二千名婦人及孩童來求診和取藥。



聖童之家：左右兩旁是孤兒院，修院及學校面對海旁，其右是醫院
(二十世紀初期)

第七章

本地聖召

當年科嘉主教在申請聖保祿修女來香港協助的書信裡，最後列出的一個理由，是為培育中國籍的修女。這個祈求中國籍女子加入修會的梦想，在五十多年後實現了。

修女們的信德、熱誠及無私的奉獻，吸引及啓發了年青的女子。早在一八五七年，聖瑪素修女曾寫信給沙爾德，提及三位女青年願意加入她們的團體；雖然，這個請求最後沒有實現，可能，時機仍是太早，對適應這陌生的會規及生活方式，少女們還未有充足的準備，感到很大的困難。

一八六二年，在越南西貢開設了第一所初學院。入會者戴本雅明修女（Sr Benjamin Dei）是第一個來自中國的聖召。她後來返回香港，度一聖善的生活，深得眾人的愛戴和敬重，實是後來追隨她足跡的中國少女的好榜樣。很不幸地，她年輕的生命，在一八九八年被灣仔的一場火災奪去。

直至一八九九年香港才有一所初學院，開始收納本地的望會生。在此之前，望會生要被送往西貢（Saigon）的初學院，其中有些是來自澳門葡萄牙籍的。來自香港的望會生很多後來留在越南，一些返回香港，一些更被揀選前往韓國、菲律賓等地，作傳教先鋒。第一位加入香港初學院的是余施蓮修女（Sr Celine Yu），她在病床上，臨終前宣發初願，時為一九〇五年。



灣仔 一八九九年二月十一日建成的初學院（二十世紀初期）

第八章

走出灣仔

十九世紀末，聖童之家的容量達到了飽和點。雖經多次在海旁東（Praya East）填海地取得新增的空間，灣仔的活動範圍仍是過度擠迫繁忙。在那狹小的空間裡，容納了修院、初學院、孤兒院、育嬰院、課室、勞作室、為傷殘老弱人士的療養院、醫務室、醫院及藥房、還有一寄宿學校。

一份呈交沙爾德的報告，給我們描述了在二十世紀初，修女所從事的慈善工作種類的繁多。

聖童之家平均每天接收五至七名棄嬰——每年約有一千九百名，其中三至四名或更多在數天或數星期後逝世。英國政府給予小量的棺木及殯葬津貼。僥倖生還的嬰兒在聖童之家被撫養成人。今天，那兒約有三百九十個一至二十歲的……他們在育嬰院、勞作室，或在療養院、盲人及傷殘者的醫院等。在鄰近的醫院裡，有五十至六十名老婦人。現有一百八十八個身體健全的女子，在兩間勞作室工作，一些負責縫補，另一些製造通花花邊，她們售賣這些花邊以維持生計，年青及較年長的女子更為歐洲家庭縫製服裝。達到婚嫁年齡的，我們為他們安排婚嫁，對象多是來自中國內陸的男教友；不願結婚的，也就留守在聖童之家。另有兩所學校教授歐籍兒童，一為法文，一為英文。現共有九十五名學生，其中二十五名是寄宿生。有二百四十六名兒童（孤兒），他們每天上課兩至三小時，為此她們聘用兩名老師。²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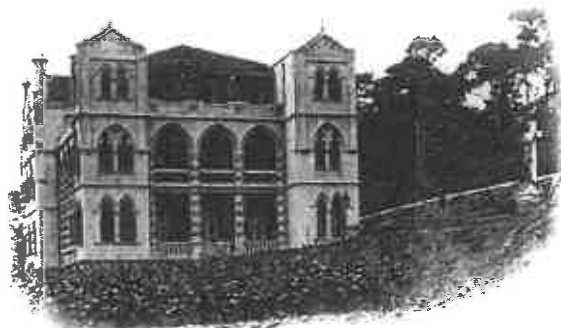
那細小的空間容納了那麼多的人，那麼多的活動及工作在同時進行，明顯地，增添空間是刻不容緩的事。數年後，已很擠迫的醫院更達到不能接受的地步。再者，一九〇四年電車開始行駛，所發出的巨大聲響，對醫院裡的病人實在構成騷擾；巴黎外方傳教會總務金神父（Fr Leon Robert）住院時，不勝其擾，催促修女遷移地方。

在灣仔找不到發展的空間，房舍兩邊被屋宇包圍，另兩邊則是街道和海水。天主的上智再次幫助她們解決了困難。一九〇二年，聖童

²⁰ Emile Legue, *Journal de la Communauté*, Vol. 1 in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Archives.

之家爆發了一場霍亂疫症，促使政府認真注意菲力斯姆姆增加土地的訴求。巡視院舍之後，衛生局局長建議菲力斯姆姆須把兒童留在屋外，以防過度擠迫。對此，菲力斯姆姆反應激烈，向他說：「我已準備好蓋一所新房子，只要政府能給我一些土地…」。²¹

之後，事情進展迅速多了。督察官親自處理這事，修女的要求被提交至英國的國王。一九〇三年八月十七日，政府授予修女一塊在跑馬地的土地；四十年前，這片土地本是華人墳場。修女請來工人清理場地，把掘出的骨頭歸還家屬，進程卻非常緩慢。菲力斯姆姆的健康狀況不穩定，因此她未能全力處理此事。她感到非常疲倦，最後不得不與另一位同樣需要休息的修女，往上海稍作歇息。期間，跑馬地的工程繼續緩慢地進行；待至一九〇六年，面對黃泥涌道的石牆建成，才開始建造房舍。



跑馬地「加爾瓦略山」最初是灣仔孤兒院及醫院的分支

終於在一九〇七年聖誕日，菲力斯姆姆以一隊列的車輛，把患病的嬰兒及長期病患者，送抵這所位於跑馬地、名為「加爾瓦略山」(Le Calvaire) 的新居所。很多人提問：為什麼要稱作加爾瓦略山？

這所房子為我是加爾瓦略山，可能也是將來的好預兆，所以它以此為名…。為什麼害怕加爾瓦略山？我們的主基督不是說過，人必須經過苦難的磨練，才能進入光榮嗎？²²

她把一巨大的、花崗石製的十字架放在進口處，以紀念深受修女愛戴、已亡的和主教。新屋宇搬進翌日便由師多敏主教(Bishop Dominico Pozzoni) 祝聖，但正式的開幕禮卻於一九〇八年一月六日舉行。師主教在他的講道中說，因亨利·亞瑟·卜力爵士(Sir Henry Arthur Blake) 的推薦而獲得土地，由瑪竇·彌敦爵士(Sir Matthew Nathan) 主持奠基，現在則由弗德烈·盧押爵士(Sir Frederick Lugard) 正式揭幕。

²¹ 同上註 Vol. 2

²² Marie Paul Bord, *In China*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1996) , p.16



香港首位省會長菲力斯·佐頓姆姆（1891-1926）

在灣仔的原修院，則用作醫院的附屬院舍，收容病弱的老人；直至一九一八年，醫院被遷移至銅鑼灣。一九二三年，「安貧小姊妹會」（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修女抵達香港，菲力斯修女把五十名老人交給她們照顧，幫助她們展開服務。

第九章

新的服務中心

修女的工作由灣仔轉移至跑馬地，但噪音的問題仍未能解決，為正身受病苦的人，那是極難忍受的。金神父再次提出要求，催迫修女把醫院遷往另一地方。至一九一四年，事情有了轉機；她們獲悉在銅鑼灣有一大棉紗廠——「香港棉紡織染公司」(Hong Kong Cotton-Spinning, Weaving and Dyeing Company) 出售物業，包括土地及廠房。棉紗廠因不願面對劇烈的競爭，決定轉往上海經營。保祿·遮打爵士 (Sir Paul Chater) 在這龐大的計畫中，是修女慷慨的贊助人及「保護者」，他購入灣仔的物業，並幫助修女以一合理的價錢，獲得銅鑼灣的廠房。

修女搬遷至銅鑼灣，在那兒展開她們的服務，實是明智的決定，上主的安排。

這是一勇敢、甚而冒險的嘗試。在當時，銅鑼灣也可算是貼近市區，在市區內有電車行走，但在那遙遠的地區，卻沒有交通工具。香港棉紗廠附近只有很少的房屋，棉紗廠是那區內最大的一間了…。它的位置被描寫為「處於跑馬場及銅鑼灣馬球場」之間。很少人認為那兒會發展成住宅區。²³



禮頓道聖保祿機構正門入口。左邊是中文學校，正中是英文、法文學校，右邊是孤兒院。（二十世紀二十年代）

再者，它的周圍是沼澤地，瘴疾猖獗。

²³ Ryan, p.30



從棉花路遙望聖保祿機構。左起為修院、初學院、學校和醫院。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

在獲得沙爾德的認可後，金神父被委託全權代理，他不單處理灣仔及銅鑼灣物業的買賣，更負責把棉紗廠改裝。他把殘舊的工廠轉變為一小城市，內有修院、孤兒院、學校及醫院。整個計畫需時三年，師主教稱之為「龐大的創舉事業」。

廠房的改裝及維修工程始於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待第一座建築物落成及獲得入住准許後，灣仔的歷史性遷移便立即開始。由修女照顧的孤兒人數眾多，他們首先獲被安置在最大的房舍內，那兒有兩個大的內庭院，可作遊樂場之用。一九一五年十月六日舉行賣物會，慶祝孤兒院喬遷之喜，獲港督梅軒利爵士（Sir Francis Henry May）的太太——梅海倫娜夫人（Lady Helena May）蒞臨祝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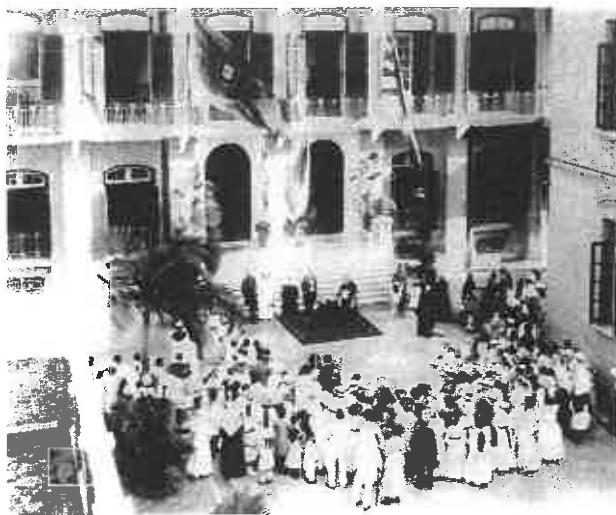
Congrégation des Sœurs de Saint-Paul, 5, rue Saint-Jacques, Chartres (E.-et-L.)



銅鑼灣的孤兒及殘障者

翌年，銅鑼灣的學校也在翻新了的棉紗廠舉行開幕禮。港督梅軒

利爵士在夫人及秘書的陪同下，在學校進口處舉行剪綵儀式。



銅鑼灣學校的祝聖及開幕禮 一九一六年十月

最後遷離灣仔的是醫院。舊工廠工人宿舍的地盤需要大規模的重建，更需要大量的資金。菲力斯姆姆深感到這龐大工程的壓力。

她埋怨自己的衝動，沒有充足的資金而作出如此巨大的承擔…。她唯獨投靠天主及祂仁慈的眷顧，上主從不遺棄行事正直、尋求天國來臨的人。²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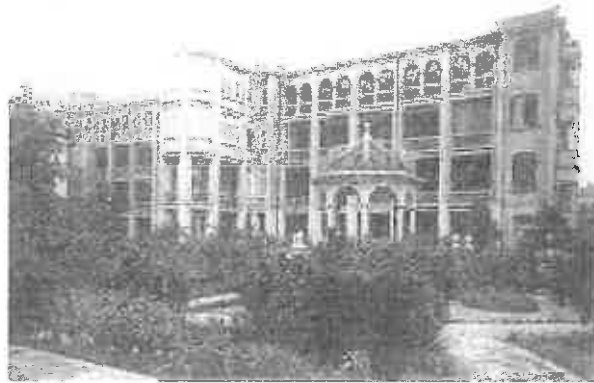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四日，醫院由師主教祝聖，並沒有舉行其他儀式或開幕禮。在修女努力的耕耘下，醫院很快成為香港最優秀、設備最完善的醫院之一；修女辛勤的奉獻，獲得社會人士的讚揚。在《印度支那經濟復甦》(*Economic Awakening of Indo-China*)雜誌中的一篇文章這樣描述醫院：

該院駐有一英國籍醫生，為貧苦大眾服務，但該院的所有醫生都擁有行醫資格…。照料病人的工作則由八位法國修女及兩位中國修女主持，有四位由馬尼拉修會屬下學院畢業的護士…從旁協助。該醫院的手術室為香港最完善的手術室…。醫院還設有產科，分頭二等的病房，還有普通病房及置有新式設備的特別護理室，裡面有特別的雙摺床等…。

頭等病房除設有一張病床外，還有一張床，專供陪伴病人的親友用的…費用每天為七元。二等病房費用為四元至五元，房內的設備與頭等的大同小異，只是沒有那些豪華的設備而

²⁴ Bord, pp.23-24

已，食物方面也比頭等病房較少選擇。三等病房設有四張病床…病房費用為一元五角。對於那些完全沒有能力支付藥費的病人，醫院免費為他們診治…。此外，還有一所特別的診症室，特別為貧苦的中國人而設，主診的醫生是年紀老邁的安娜修女（Sr Anna），她在香港行醫及推動慈善工作已有三十五年了。在貧苦大眾的心目中，她是香港最佳的醫生。²⁵



一九一八年由灣仔遷往銅鑼灣的聖保祿醫院

金神父和菲力斯修女的心血及辛勞確實沒有白費。

人們通稱那所醫院為法國醫院，已成為遠東最優良、設備最先進的醫院之一。而寬敞的孤兒院也裝置了不同的設備，為所收容的可憐女孩子提供多類型的訓練。²⁶

一九三一年，「佳士得耶公司」(Gestetner)慶祝五十週年金禧紀念，同時推出他們首部電動複印機。他們舉行投票活動，要選出全港最優秀的醫院。聖保祿醫院榮登榜首，隨後是「東華醫院」(Tung Wah Hospital)。

當時灣仔的物業售予「香港置地公司」(Hong Kong Land Company)，公司把它發展，並於一九一七年開發成兩條街道，即蘭杜街 (Lendale Street) 及晏頓街 (Anton Street)，那是取自「英商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 and Co) 兩位大班的名字——達味·蘭杜議員 (Hon. David

²⁵ Jean Vaudo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在中國傳教簡史 一八四八年 - 一九二六年》，中譯本 (香港：1980)，頁 120-121。

²⁶ Ryan, p.15

Landale) 及查理士·愛德華·晏頓議員 (Hon. Charles Edward Anton)。²⁷

最初，在灣仔聖童之家的學校，包括中文、英文及法文三個部門，只算是修女多項工作的一部份，沒有特別的部門名稱。一九一五年遷移至銅鑼灣時，修女給予一個新的名字，稱為「聖保祿機構」(St Paul's Institution)。稍後，於一九二〇年，學校才有自己的名字——「英法學校」(Anglo-French School)；戰後，改稱為「聖保祿學校」(French Convent School)，一九五五年才把英文校名轉為「聖保祿學校」(St Paul's Convent School)，一直沿用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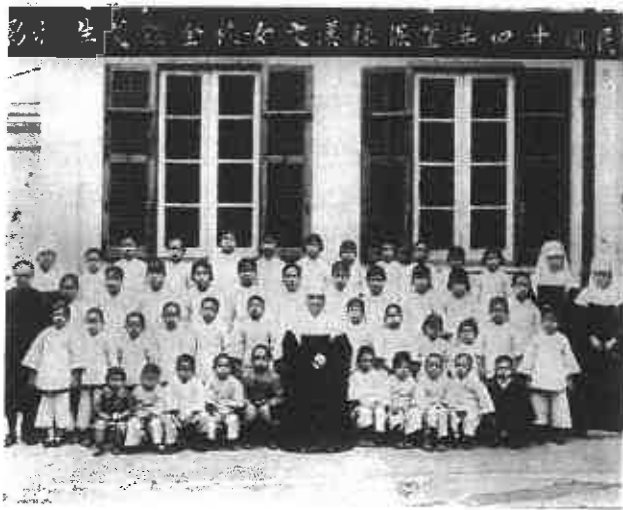


「英法學校」的寄宿生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師主教一直渴望在(維多利亞)城外設立一漢文學校。自一八五〇年始，修女在灣仔已為孤兒們設有一本土語的學校，更在一八七六年，為外籍兒童開辦英語及法語學校。一九二四年二月，「漢文女子學校」(Chinese Girls School) 開放給公眾，讓有意以本土語求學的人士加入。這滿足了主教最後的心願，因他在同一個月逝世。

漢文女子學校開校時有三十六名小學學生，分為四級，有五位老師；家境清貧的學生可獲免費入讀。一年後，學生人數增至一百二十五人，因此加開兩班；一九二六年增設幼兒班及五年級。同年有十名小學畢業生，為協助這些畢業生繼續學業，於一九二九年開辦中學預備班，雖是試驗性質，效果也頗理想；一九三一年開辦高中班級。由那年開始，每學年的開課日期，由春季改為秋季。一九三三年，首五名中學畢業生獲頒授畢業文憑。

²⁷ Smith, p.122



一九二四年開辦的「漢文學校」

一九二七年二月，在跑馬地開設分校，由一九三〇年至一九四五年間，稱為「聖瑪加利漢文學校」(St Marguerite's Vernacular School)，即現時聖保祿天主教小學的前身。

爲了讓灣仔英語部的學生有更好的培訓，使他們能適應商業界的要求，於一九一三年開辦打字的特別課程，一九一五年加設速記課程。那時，女子沒有進入大學的機會，因爲至一九二一年，「香港大學」(Hong Kong University) 才開始招收女性。²⁸ 一九三三年，銅鑼灣的英法學校開辦晚上的速記速度班，特別訓練學生們的速記速度，由一位葛達太太 (Mrs Goddard) 教授。至一九四〇年，姬瑪利·聖心修女 (Sr Marie du Sacre Coeur Gil) 開辦首次的商科課程，學生有十二人。



姬瑪利·聖心修女與初期的商科班

²⁸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ast and present* (Hong Kong :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1993) , p.59

當修女遷移至銅鑼灣時，政府授予她們一項新的工作。在不遠的山邊，有一所「聖保祿庇護所」(St Paul's Refuge)，本是「庇理羅士感化院」(Belilios Reformatory)，由一位著名的猶太慈善家厄瑪奴爾·拉法·庇理羅士 (Emmanuel Ralph Belilios) 捐贈予政府，為教導男童。可是，從沒有收錄任何人，曾收納了一名男童，但沒多久，他便逃走了。一九〇九年，立法會質疑它作為分支監獄的功能，那不是捐贈者的原意。他們提議把它交予「愛爾教區庇護所」(Eyre Diocesan Refuge)，那是「聖公會」(Anglican) 的一個慈善機構，專收容被遺棄的中國少女及婦人。²⁹

一九一四年，庇護所的德國籍總監，因歐洲連連的戰事，須偕同其他德籍居民離開香港，庇護所便搬往九龍。³⁰ 翌年，政府把那所屋宇的使用權轉給修女。

…他們照顧困境中的婦女，她們多來自中國內陸，當中國事務秘書接收到這些有需要的婦孺時，便常把她們帶到這兒。她們可從事多項工作：洗燙、縫紉、家務，甚至園藝。這庇護所多年來肩負了重要的任務，以不顯眼的方式，為有需要的婦女提供康復之路。³¹

一九二五年，那兒有四十五人。一九三二年六月，政府收回屋宇，以發展另類的工作。

²⁹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inutes of the Meeting, 7 October 1909, <http://www.legco.gov.hk/1909/h091007.pdf>

³⁰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inutes of the Meeting, 3 December 1914, <http://www.legco.gov.hk/1914/h141203.pdf>

³¹ Ryan, p.188

第十章

基督君王堂

當修女把灣仔所有的工作，都成功地搬遷至寬敞的銅鑼灣新址後，菲力斯姆姆開始計畫另一夢想：在這場地的中央建造一聖堂，以敬禮主基督。這原已包括在金神父最初的計畫中，但工程受到延誤，一方面欠缺資金，另一方面中國內陸出現了麻煩。

隨著所有的債務於一九二三年清還後，新的育嬰院於一九二五年相繼落成，菲力斯姆姆再次與金神父商討這計畫。可惜的是，猶如梅瑟當年領導選民翻越沙漠，自己卻未能進入天主許諾的福地，她及金神父同樣未能目睹他們所開展的工程完成。一九二六年六月，金神父返回法國，而菲力斯姆姆竟於同年七月去世，回歸父家；兩人都未能享見他們的夢想成真。

她忠誠地、能幹地在香港的會院團體服務了三十六年，其中三十五年為省會長。她的任期富有特色，展開了龐大的擴展，修女的工作由灣仔伸展至跑馬地，再進展至銅鑼灣，甚而到中國內陸。也是她實踐了科嘉主教的最後兩個心願：醫院及初學院。現在，留待她的繼承者瑪加利·聖保祿·盧斯姆姆（Mother Marguerite de St Paul Nuss）——她喜歡人稱她為保祿姆姆（Mother Paul），及接替金神父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衛神父（Fr L Vircondelet MEP），去完成她最後的心願。然而，為基督建造聖堂卻也碰到很大的阻撓——主教的反對。一九二八年提出申請時，香港宗座代牧（Apostolic Vicar of Hong Kong）恩理覺主教（Bishop Enrico Valtorta）因恐防建築費過於高昂而不願意批准。後考慮到傳教工作的需要，他提議建造一座較廉價的建築物以達目的，餘錢則更好用作發展他們的慈善工作。三年前，當地的報章曾刊登有關修女將在銅鑼灣興建一座三十萬元的聖堂。保祿姆姆向主教解釋那並非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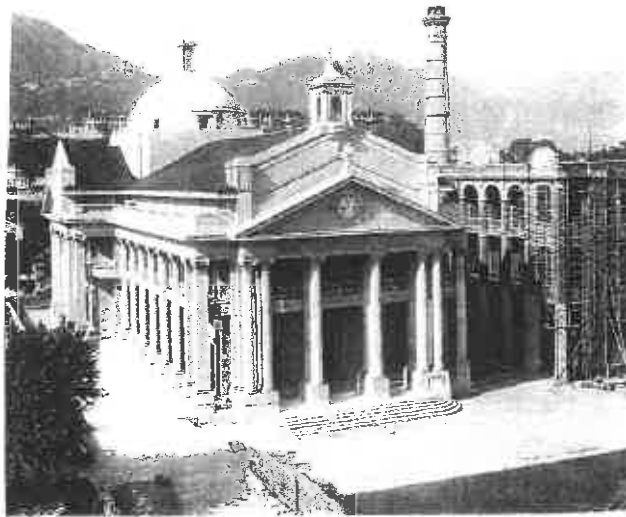
現在是一全新的計畫，很簡單且不用花費分文。聖堂將簡單地採用磚及強化混凝土建造，內外都沒有華麗的裝飾。聖堂內部唯一特出之處是那圓拱屋頂，也只以強化混凝土建造，建築費不會因此而增加。根據建築師的估價，建築費不會超越十三萬...。³²

³² Bord, p. 26-27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四日，恩主教喜悅地主持聖堂的奠基石祝聖典禮。

敬愛的姆姆，你常向我說：要使「基督君王堂」(Christ the King Chapel) 宏大而美麗。是的，它應是宏大的，美麗，它更應是。首先須向建築師陳納堂先生 (Mr Chanatong) 致謝，他把這項工程作為禮物送給我們。聖堂會是寬敞的，明亮而通爽。內部沒有一根柱子，從聖堂內任何角落都可看到祭台，這正符合什麼都走向它，都以它為中心的原則，也是每一聖堂的所以然。³³

兩年後，宏偉的基督君王堂落成。正祭台為意大利雲石，獲熱誠的友人慷慨捐贈，法國的藝術家加以雕刻。威廉·賈納先生 (Mr William Gardner) 贈予一雄偉的耶穌聖心雕像，他的兩位女兒正是我們的修女——聖若望 (Sr St Jean) 及麗達修女 (Sr Rita)。英法學校的聖母孝女會 (Children of Mary) 則贈送一非常美麗的聖母無原罪雕像。



基督君王堂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一九三〇年五月十日上午舉行新聖堂的祝聖及奉獻禮，下午則舉行感恩典禮，由中國貴陽宗座代牧 (Vicar Apostolic of Kweyang, China)、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施恩主教 (Mgr Francois-Lazare Sequin) 主禮，另參與的不少於六位主教，儀式感人。共祭神長除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亨利·恩理覺主教 (Mgr Enrico Valtorta) 外，還有汕頭宗座代牧 (Vicar Apostolic of Swatow)、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實茂芳主教 (Mgr Adolphe Rayssac)，嘉應州 (梅縣) 主教 (Bishop of Kaying-Chow -- Meixian)、美國天主教傳教會 (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 Inc., Maryknoll

³³ 同上註，頁 27。

Fathers, MM) 會士福爾德主教 (Mgr Francis Xavier Ford), 北海主教 (Bishop of Pakhoi)、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賚主教 (Mgr Jean-Baptiste Penicaud), 及納匝肋會院 (Nazareth House) 院長、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祝福主教 (Mgr Gustave-Joseph Deswaziere) 等, 由耶穌會 (Society of Jesus) 蔡伯德神父 (Fr Patrick J Joy) 證道。

聖堂是一私人物業, 故不會公開給公眾使用。但很快地, 很多天主教信徒, 甚至主教本人也向修女請求, 准予他們參與感恩聖祭; 自然地, 他們的請求沒有被接納。為免因拒絕別人而引起尷尬, 主教逼於無奈地, 於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發出告示, 向公眾宣佈聖堂乃私人重地, 只為聖保祿機構使用; 若有修道團體按照規例在那兒舉行特別會議、神修活動或退省、又或轉衣發願禮儀等, 則作別論。

度過九年的熱誠服務, 保祿姆姆於一九三五年返回法國, 由於健康衰退, 她再沒有返回香港。接替她的是聖沙勿略·維美斯姆姆 (Mother St Xavier Vermeersch), 她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比利時籍傳教士, 曾多年服務於越南、泰國及菲律賓, 到香港前, 已在菲律賓出任省會長凡十二年。

聖沙勿略姆姆常尋找新的方式回應新時代的需要, 一九三七年, 她在基督君王堂背後開辦了一所為年青女職工及女訪客而設的宿舍, 名為「法國修院宿舍」(French Convent Hostel)。



Our Lady's Hall

- No. 510, SUAN ROAD
- **Ideal Situation**

◆ Approved place of reside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Under the management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For particulars apply to the

REV. MOTHER PROVINCIAL,
FRENCH CONVENT

「聖母宿舍」

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請求聖沙勿略姆姆在太古樓 (Tai Koo Lau) 開辦一所中文學校，因為在薄扶林有一天主教華人團體，他們起初是由法國神父從中國帶來香港，為協助神父們在「伯大尼會院」(Bethanie) 及「納匝肋印刷所」(Nazareth Press) 的工作。這團體由數個家庭開始，至一九二四年，已增長至二百五十位教友。³⁴ 神父的要求被接納，一九三七年五月，三位修女被派往管理「聖約瑟女子學校」(St Joseph Girls' School)，還有一所小型的診所及藥房。

耶穌會於一九二六年抵港，三年後，他們開辦了「利瑪竇宿舍」(Ricci Hall)，那是一所天主教宿舍，專為香港大學的男生而設。一九三九年，耶穌會佐治·博爾神父 (Fr George Byrne) 計畫開創一所專為大學天主教的女生宿舍，他與聖沙勿略姆姆商討，並獲得贊同；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日，「聖母宿舍」(Our Lady's Hall) 隨之啓幕。

³⁴ Alain le Pichon, *Bethanie and Nazareth - French secrets from a British colony*, (Hong Kong :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2006) , p. 125

第十一章

邁向九龍

屬於政府的「九龍醫院」(Kowloon Hospital)於一九二六年在旺角開設，很快地，它已宣告「過度擠迫」。當時，由於中國內陸的政治動盪和不安，引致香港的人口，特別是在九龍，急速上升。

恩理覺主教一直勸諭菲力斯姆姆向九龍發展，因為九龍的土地面積比香港更大。一九三一年，保祿姆姆策畫在九龍創建一所醫院，地點擬在太子道(Prince Edward Road)的一段斜坡上。「可是，後來發現，該位置鄰近機場，建築物的高度受到限制，故不能在該址建造我們計畫中的大樓。」³⁵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不太熱衷在九龍醫院附近設立一所私家醫院。受著重重的障礙及困難，雖然主教不斷要求重新考慮，該計畫於一九三五年終被放棄。主教感到非常失望，其間有兩個修道團體表示願意承辦這個計畫，但主教屬意聖保祿修女照管醫院，故他寧願等待。

一九三五年保祿姆姆離港返回法國沙爾德，參加修會的總代表大會，會議結束後卻沒有回到香港。接替她的是聖沙勿略姆姆，她於一九三六年在九龍買了一座平房，開辦孤兒院接收棄嬰，名為「聖德肋撒育嬰院」(St Teresa's Nursing Home)。部份平房用作小型診所，一些慷慨善心的醫生醫護貧窮的病患者。一九三八年，政府不再反對，聖沙勿略姆姆於五月便向政府重提保祿姆姆建院的計畫。



一九三六年的「聖德肋撒育嬰院」

同期，「九龍居民聯誼會」(Kowloon Residents Association)非常渴望在九龍多增一所醫院，他們於一九三九年致函多個機構，包括透過宗

³⁵ Ryan, p.210

座外方傳教會會士顏思回神父 (Fr Andrew Granelli) 上書給天主教會，顏神父是新建的「聖德肋撒堂」(St. Teresa's Church) 的主任司鐸，他把他們的請求轉達恩理覺主教，主教再次強烈地向聖保祿修女提出他的請求。

誤會隨而接踵而來。不幸地，不知爲了什麼原因，沙爾德總院給予否定的答覆，這使恩理覺主教極度不滿，他立即寫信給沙爾德的總會長，清晰地表達他深深的遺憾及困擾。

容我再次歇盡所能地要求，因爲，作爲香港的主教，我認爲在這差不多一百萬人口的城市裡，設立一間天主教醫院是非常重要的。

我懇求你們的修女，因爲我覺得她們在香港聖保祿醫院的管理工作辦得非常成功。你們的猶疑——我差點要說，你們的矛盾，真的使我很失望。我不能理解，你的省會長向你要求的，不是增加修女或金錢，只是簡單地請求你的批准…。

倘若你仍對這項工程不能給予一肯定的答覆，可是你曾多次給予准許，未來，當教區有重要的宗徒工作時，我也只好轉向別的修會了。³⁶

主教曾告知教廷駐華大使 (Papal Nuncio to China) 有關九龍急需多一所醫院，及曾與聖保祿修女商討時所遇到的困擾，教廷駐華大使乘他返回歐洲之便，跑往沙爾德母院拜會總會長。總會的長上們向他解釋，雖然有關建築那所醫院的信件來來往往，卻從沒有正式請求批准，也沒有附上圖則或預算案等。

疑團頓釋及獲得准許後，醫院的各項建築工序進行順利，在短短的八個月內，工程便完成。新醫院有六個病房，七十五張病床，以堂區的主保命名，稱爲聖德肋撒醫院 (St. Teresa's Hospital)。正式的開幕典禮於一九四〇年十月三日，聖德蘭·里修 (小德肋撒) (St Therese of Lisieux) 的瞻禮日舉行，但醫院在九月十四日已開始接收病人。

³⁶ Bord, p.68-69



聖德肋撒醫院於一九四〇年啓用

第十二章

戰事年代

新開啓的聖德肋撒醫院發展迅速，九龍區的居民感到十分興奮和喜悅。但他們的喜樂未能長久，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啓德機場（Kai Tak Airport）被轟炸，醫院鄰近機場，立即擠滿了傷者。消息像野火般迅速蔓延，日本軍來了！戰鬥延續了數天，十二月十一日黃昏，修女目睹英兵乘軍車退到香港島。日本軍人數比英軍多，故能迅速地向著香港推進。年青的士兵懷著鬥志，準備作戰到底，無奈已損失了很多生命，英軍被迫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投降。

修女堅守醫院，繼續服務，直至一九四二年二月某天午夜，她們突然接到日軍統領緊急通知，命令修女須於翌日清晨七時前離開醫院。她們整晚趕快執拾行裝。

翌日，修女們搬進原屬於數個家庭的五所房子，位於窩打老道（Waterloo Road）的巴頓先生（Mr Barton）、費嘉度先生（Mr Figueiredo）及蘇納德醫生（Dr Bernardo de Sousa）等的房子，這些家庭被日軍扣留在赤柱（Stanley）。修女在那兒設立一個小診所，一向對修女友善的醫生沒有放棄修女，每天踏著單車前來，因為他們的汽車全遭日軍強行徵用。

一九四二年七月，曾於我們醫院接受治療的阿根廷領使到了日本東京，他往見日本高層，訴說日軍對修女的不公義。主管香港戰俘營的軍官便接到一道命令，須立即把醫院交還給修女。八月十五日，修女重返醫院，卻遭禁止接收病人。九龍區的居民奮力為修女爭取，他們哀求日軍要員，准許修女營辦一所診所及藥房，可是，他們未能如願以償。一九四三年七月，「日本衛生部」（Japanese Medical Department）召叫修女，告訴她們「日本民政部」（Civil Japanese Department）欲再次徵用醫院，為醫治平民，不過，軍方將支付租金，為打退他們的主意，修女開出高昂的租值；「自衛隊辦公廳」（Civil Defense Office）多次召見她們共同商議，修女卻堅持到底。經過兩個月的交涉，毫無結果，修女們再次被召見，這趟可不是自衛隊辦公廳，而是一官階甚高的軍官，他態度冷酷，修女們卻如常地堅守立場，軍官最後強橫地發出命令，無論修女喜歡與否，他們也會佔用醫院，最後限期是八月十五日。日軍更把醫院易名為「博愛醫院」（Pok Oi Hospital）。

聖母升天節日，修女們的物品被放到卡車上，由苦力拉到油麻地碼頭，修女則步行至佐敦碼頭，乘渡輪往銅鑼灣。

在跑馬地的「加爾瓦略山」會院也被日軍佔用，修女被逼帶著行裝遷往銅鑼灣。學校幸好獲准在銅鑼灣繼續開辦，但有嚴令不准教授英文，代之須教授日文，而銅鑼灣原有的學校則被關閉。

在日軍佔領加爾瓦略山會院期間，菜園被改作細小的牢房，囚禁華籍及一些歐籍的囚犯，後把他們處死。園中巨大的銅十字架也被毀壞，銅則被用來製作軍械。

一九四一年，銅鑼灣的孤兒院仍有九十五名嬰孩、一百零六名兒童及成人，在醫院內則有二百二十九名老弱傷殘者，另有約六十名病人。如何養活他們？還有修女及寄宿生！聖沙勿略姆姆面對的是一惡夢。一名學校寄宿生陳香梅（Anna Chan），在她的自傳——《香梅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nna*）中，記述了第一枚炸彈落下香港時的情況。她下嫁給二次大戰期間著名的美國英雄陳納德將軍（General Claire Lee Chennault），她自己也成了一著名的記者、作家，後更成為美國共和黨總統（US Republican Presidents）甘迺迪（Kennedy）至列根（Reagan）期間的特別顧問。

所有的食店關閉，我們缺乏供應品……我們，包括五十名修女及寄宿生，每天早餐只有一塊麵飽，晚餐是半碗飯。³⁷

沙勿略姆姆須作出艱難的決定，她讓一些修女踏上危險的旅程，分批送往越南。望會生及初學生可選擇回家，六十六人中有二十九個選擇離開，初學院隨而關閉。

銅鑼灣修院座落於軍事中心的危險地帶，北面有被日軍佔用作儲存油及軍火的「英商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貨倉，南面是「掃桿埔軍事訓練營」（Sookunpoo Military Training Field），東面是「德士古油庫」（Texaco），西面是一停車場及小型軍械廠。轟炸期間，不單有來自日軍的炸彈，更有來自英軍的。只有聖堂及部份醫院能奇蹟地避過頻密的轟炸。據估計，戰爭初期，落在我們範圍內的炸彈不下二百個，三個分別落在聖堂、醫院及孤兒院的工作室內，卻都沒有爆炸。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這些都是天主慈愛護佑的實證。

³⁷ Anna Chennault, *The Education of Anna*, (New York: Times Book, 1980), p 43

戰爭爆發前，政府作了準備，提出徵用醫院及其他鄰近的樓宇，修女宿舍及聖堂除外。修女及初學生們都上了由「瑪麗醫院」(Queen Mary Hospital) 舉辦的急救課程，學習簡單的家居護理。戰亂期間，整個地方成了醫院及避難所，擠滿病人及傷者，學校及孤兒院也轉作醫院用途，課室更被用作手術室；後來，連聖堂也要用來容納那大量的傷者。來自瑪麗醫院的醫護人員及一些英籍軍官加入駐守，當英籍醫生及護士被拘留在集中營時，華籍的護士便來替代英籍的護士；醫院只接收華籍平民，患病的、受傷的，數量非常多。

聖堂常響起警報，修女背誦詠唱聖詩及歌曲，振作精神。在這危險不穩定的時刻，耶穌會的神父，特別是嘉利華神父 (Fr Robert W Gallagher) 和祁祖堯神父 (Fr Gerard Hugh Casey)，常在病人身旁，安慰病者、給予修和聖事、為垂危者付洗、為教友施放病人傅油聖事，準備他們踏上永生的旅程；又有誰能保證自己不會在瞬息間遭逢巨變呢？在這備受壓力的時刻，多少傷殘的、病弱的及垂危的，在修女的手中獲得照料，領受聖洗的人更達數千。

修女每天生活於混亂、破壞及痛苦中，卻沒有想到，更壞的將要來臨。一九四五年，戰事臨近結束之時，悲劇突然降臨。四月四日那天，幸好是兒童節，是學校假期，美國戰機不停在銅鑼灣上空盤旋，數秒鐘後，警報響起，人們爭相走避，躲進防空洞內，轉瞬間，在修院範圍內，炸彈如雨般落下；美軍企圖轟炸日軍在加路連山 (Caroline Hill) 的電油及火藥庫，卻誤炸中「仁愛小城」(City of Charity)。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銅鑼灣的鳥瞰圖。可見孤兒院及部份中文學校被完全破壞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

在電光火石間，奪去了五十人的性命，包括六位修女。所有建築物不是完全被炸毀，便是嚴重受損；但奇蹟地，聖堂竟再一次絲毫無損！餘下破爛的房子已不能居住，六百人頓失蔽身之所。聖沙勿略姆姆飽受驚嚇，整個星期之久，她的精神健康瀕臨崩潰，差點兒喪失了性命。她偕同四十位修女及一百名孤兒，不得不投靠嘉諾撒會修女。透過澳門主教善心的協助，部份修女及孤兒撤離香港，往澳門「嘉諾撒修會」（Canossian Sisters）及「天神母后修會」（Our Lady of the Angels）暫住，達十一個月之久。

第十三章

戰後重建

無論對生命或財物，戰事都構成了非常嚴重的破壞，修女們只好重新開始。沒有浪費片刻時間，修女們立即回復正常的生活及工作。銅鑼灣及跑馬地的學生，同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一日在跑馬地復課。在銅鑼灣的房子，經過緊急維修後，英文及法文部遷回銅鑼灣。全部孤兒及老弱者也遷往銅鑼灣，跑馬地全用作漢文學校，包括銅鑼灣學校的中文部。商科部仍留在跑馬地，至一九五一年才遷回銅鑼灣。

九龍聖德肋撒醫院費了五個月的時間清理及重整，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重開。醫院盡量改善，以克服戰事帶來的禍害，但設備卻仍落後，未能解決病人的需求。

一九四九年，銅鑼灣的重建工程完成。一幢新的孤兒院，易名為「聖保祿育嬰院」(St Paul's Orphanage)，於九月開辦，一些孤兒重回育嬰院。戰後，很多男士失業，很多家庭被迫拋棄嬰兒。再者，由於香港房屋短缺，業主常拒絕把房子租給有嬰兒的家庭。因此，大量可憐的幼小嬰兒，被送到育嬰院門前。

香港的人口，在戰亂期間大量減少，於一九四五年回升至六十萬，一九四七年更增至一百七十五萬，且以每年平均增加七萬五千人的速度增長。香港聖保祿醫院於一九四九年加建產科新翼「聖母產科醫院」(Pavillion Notre Dame)，以紓緩產科服務的需求。

當學校、醫院及育嬰院的服務重上軌道，初學院於一九四八年五月也接收新會員，一些工作卻被迫放棄；其中包括太古樓的聖約瑟女子學校，銅鑼灣的法國修院宿舍改為容納學校的寄宿生，在香港大學的聖母宿舍更被永久關閉。

聖沙勿略姆姆歷經戰爭的衝擊，更要在艱苦的時刻，肩負管治整個團體的壓力，辛勞損害了她的健康，當她從嘉諾撒修會返回時，便住進了聖保祿醫院。但她毫不理會自己老邁的年紀及潺弱的身體，仍不懈地負起重修戰爭遺留下來的破壞，直至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保蓮·費格姆姆 (Mother Pauline Figus) 接替她。聖沙勿略姆姆的健康一直沒有起色，於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三日病逝。

香港省會長首次有四位助理協助，構成省議會。保蓮姆姆於一九四九年七月歡迎第一位菲律賓籍的傳教修女到港，她是迺依撒伯爾·天神修女（Sr Isabel of the Angels Narciso）。香港修女數目因戰事而驟減，迺修女的到來，正好增添人手，分擔修女們繁重的工作。



一九五九年 銅鑼灣：會院、初學院、聖保祿機構（英文及中文學校）、醫院及婦產部、育嬰院、孤兒院、寄宿學校…等

戰後的香港正從戰爭的恐懼、毀滅性的破壞中，努力振作爬起來；卻於一九四九年，因中國落入共產政權，香港的存亡又再次受到威脅。當共產黨戰勝「國民黨」（Nationalists），毛澤東（Mao Zedong）宣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香港的形勢受到很大的衝擊。不斷湧入香港的難民潮，致使共產黨（Communist）政府封鎖中國與香港的邊界。數以千計湧入香港的難民中，不少是神父、修道人及教友。保蓮姆姆歡欣地接待了上海的奧斯利姆姆（Mother Auxiliatrix）、「善牧會」（Good Shepherd）的修女、「聖奧斯定嘉諾撒」修女（Canonesses of St Augustine）、還有其他修會。香港的天主教人口由一九五〇年的五萬上升至一九六〇年的十五萬。

聖保祿修女在中國內陸的多個傳教站，戰爭時雖沒有關閉，現在也要一一被迫放棄，包括 — 福州（Fuzhou）、海南島（Hainan Island）、昆明（Kunming）等地。一九四九年修女從福州退出時，把約二十名孤兒帶同來港。由於銅鑼灣的居住環境已非常擠迫，修女於一九五二年把孤女們搬往寶珊道（Po Shan Road）舊有的聖母宿舍，改稱為「聖貞德工藝室」（Ouvroir Ste Jeanne d'Arc）。

由中國來的難民充塞著香港，他們隨處為家，在山邊、在路旁，在任何一個可以停留的地方。數以千計的難民湧入，使香港慈善機構

提供的社會福利服務超越了極限，為解決這個問題，香港天主教區動用了龐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一位法籍修女探訪難民

統籌照顧這些中國新移民的重大工作及責任，落在新委任的香港主教白英奇（Bishop Bianchi）身上，他是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接任時正在中國海豐（Haifeng）教區傳教。白英奇於一九四九年受任為主教，卻須待至一九五二年，從共產黨的牢獄中被釋放出來，才能履行主教之職。援助數千中國難民成了白主教的首項要務，他須先協助他們獲得生活的接濟和提供教育。白主教留給香港的其中一項貢獻便是開辦學校，至今仍在運作中。³⁸ 營辦這眾多的學校，白英奇主教須大量依重男女修會的協助，堂區及天主教機構也積極投入這項服務新移民的工作。

跑馬地的聖瑪加利大堂於一九五〇年在跑馬地加爾瓦略山開辦聖瑪加利大夜校，收錄三百三十名難民子弟攻讀一至六年級，每天上課兩小時；另有二百二十名兒童在銅鑼灣上課。教員都來自「聖母軍」（Legion of Mary）的義工³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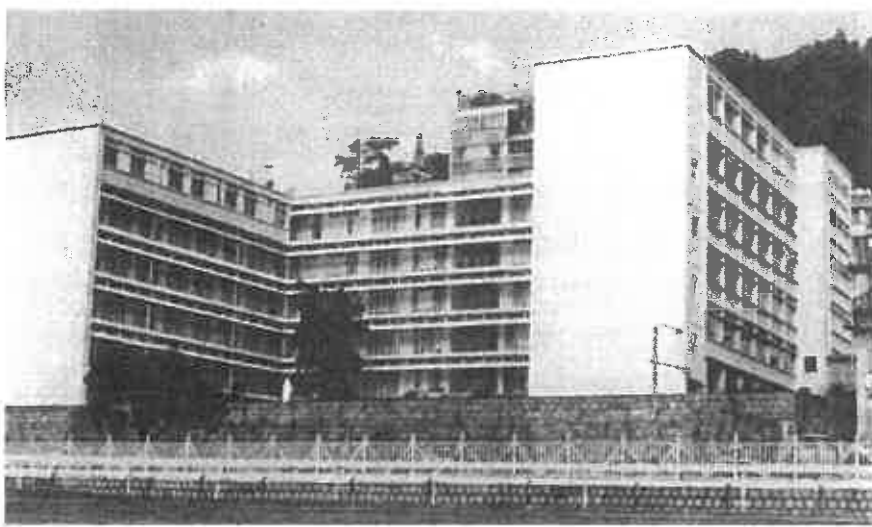
³⁸ Piero Gheddo, *Lawrence Bianchi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92), pp. 136-137

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神父掌管堅尼地城的聖母玫瑰堂（Our Lady of the Rosary Parish），那地區聚居了很多新移民，一九五九年，神父邀請修女提供援助。張佩瓊修女（Sr Marie Isabelle Tchang）— 未來的省會長，出任一所小學 — 「聖嘉祿學校」（St Charles School）的校長，另有三位修女在堂區服務。



在堅尼地城教授難民要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一九五七年，跑馬地開始了重大的轉變。幼稚園部被關閉，同時開始籌建新的中學。一九六〇年，一所理科中學 — 「聖保祿中學」（St Paul's Secondary School）正式啓幕。同年，附屬銅鑼灣聖保祿學校的跑馬地小學，轉為一所政府津貼的上、下午學校，上午為英文部，下午則為中文部。校名亦更改為「聖保祿天主教小學」（St Paul's Primary Catholic School），由原是校務主任的周耀真（周依利莎）修女（Sr. Elisa Joseph Chow）出任校長。



聖保祿中學（1960）

第十四章

新的氣息

大戰後十年，九龍聖德肋撒醫院已從戰亂的禍害中復原，且有良好的進展，醫院常住滿病人。醫生喜歡推薦病人到那兒留醫，走廊及露台塞滿病人也是常見的現象，病人須於數天前預定病房。



納德·貝克維會長（1960-1968）

一九四九年，一位年輕、充滿熱忱的比利時籍傳教修女抵港，她是三十四歲的納德·貝克維修女（Sr Bernard de Marie de Broqueville），她出任聖德肋撒醫院的新院長。醫院需要擴建，沙爾德母院立時授予准許。年輕的院長在經歷了很多的考驗和困擾後，醫院的南翼終於在一九六〇年十月三日正式揭幕。病床數目由七十五張增加至二百七十五張。

六十年代，香港教區的活動如火如荼，同樣地，聖保祿修會團體也有一番新現象。一九六〇年四月，聖德肋撒醫院那位能幹、熱誠、充滿活力的院長納德修女，被委任為省會長，她給整個團體帶來新的氣息和朝氣。首先，她在省會的組織架構方面，作了一全新、重大的改革。整個省會本全以省會長一人為依歸³⁹，貝克維會長把整個團體按照修女從事的宗徒工作：醫療、孤兒服務、學校及修院等四大範疇，分為四個會院，會院各有自己的院長。初學院則搬往寶珊道，原在寶珊道的福州孤兒遷出；但初學院也沒有在寶珊道居留太久，由於周圍新建了很多高樓大廈，一九六七年，初學院搬往上水一個比較寧靜的地方。

³⁹ Bord, 79

不單修院方面有改革，學校的組織也被重整。聖保祿學校的幼稚園、小學及中學本由同一位校長管理，現委任另一位校長負責管理幼稚園及小學部。一九六一年決定停止接收寄宿生，那時，在灣仔也有學校的寄宿生。在這些寄宿生中，其中一位成了鄧蓮如男爵（Baroness Lydia Dunn），於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二年間，她是立法及行政兩局（Legislative Council and Executive Council）的首席非官守議員（Senior Unofficial Member），對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前的歷史，發揮了很重要的影響。修女方面，除了在學校及孤兒院工作的修女外，其他修女都在修女會院、即學生曾寄宿的房舍內居住。

貝克維會長充滿傳教熱忱，活力充沛，且仁愛慷慨，為貧困的人，特別是香港當時最嚴峻的問題——難民，推動了很多援助的行動。她更踏出香港的境界，擴展至台灣。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三年，她被委任為總議員，離開香港，後重回台灣，至一九八六年因健康轉壞而退居沙爾德母院。

一九六二年，沙爾德的初學院遷往羅馬，除取錄法國女子外，也收錄能說英語的女子。貝克維會長顧念修會的未來，開始接納來自菲律賓的聖召，並把她們聯同來自香港的女子，送往羅馬的國際初學院受訓。她更鼓勵年青修女在香港或到海外接受更高的職業培訓。

六十年代，正值貝克維會長在任期間，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在香港引發起強烈的衝擊，幸好修女們沒有因此而擱置她們的宗徒工作。除了在堂區的牧民工作外，更發展至銅鑼灣以外貧困的地區。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兩位修女往深水埗「聖老楞佐堂」（St Lawrence Church）擔任牧民工作；開始時，她們在聖德肋撒醫院居住，常往探訪李鄭屋邨（Li Cheng Uk）徙置區的家庭。初期的牧民工作並不容易，很多都是所謂的「麵粉教友」，他們的信德非常薄弱，唯一的渴求是維持生計。無可否認，很多難民成為教友，只為求得到教會贈予他們的物質援助，如米、麵、麵粉、餅乾等等，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⁴⁰

一九六一年一月，在聖老楞佐堂旁設置了一細小的房間，供修女使用，房間非常細小，沒有廚房或衛生設施，生活頗困難及不方便，修女卻也能隨遇而安。除了祭衣房的工作，修女還教授要理，探訪

⁴⁰ A Granelli, "The Bumper Harvest", *Catholic Hong Kong, a hundred years of missionary activity*, (Hong Kong: Catholic Press Bureau, 1958), p. 65

教友，鼓勵及安慰難民的家庭，聆聽他們訴說困難和辛酸的遭遇。修女與教友們同甘共苦，教友們深受感動，對修女予以深深的敬重和信賴，初期的敵意逐漸減弱，修女慢慢成爲他們家庭的一份子，安慰者和顧問。

一九五九年，白英奇主教豎立他任內的另一里程碑——成立了「香港明愛」機構（Caritas-Hong Kong）。⁴¹

貝克維會長於一九六四年與明愛機構合作，開設了兩所專爲難民服務的診所，一所在銅鑼灣大坑金文泰道（Clementi Road）的木屋區，名爲「隆巴迪診所」（Lombardi Clinic），另一是位於堅尼地城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診所」（Pope John XXIII Clinic）。身爲護士的貝克維會長，總愛偷空溜出修院，跑往大坑道的診所護理那些貧病的人。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Second Vatican Council）也在這個時期召開及結束，捲起了改革的浪潮。天主教女修會的會衣也是其中一項，修女們開始改革她們款式古舊落伍的會衣，不少修會甚而索性取締穿著會衣，改穿時款的便服。超過兩個半多的世紀，聖保祿修女一直穿著沿自法國十七世紀農民服式的會衣，只於一九五三年曾作輕微的修改。一九六六年，本較適宜寒冷國家的會衣款式，改爲較簡單及輕便，這使在遠東的修女，包括香港，感到欣喜。會衣的改革是漸進的，首先是那頂古老的帽子（cornette）被頭紗所取代；數月後，會衣的款式也被修改。

六十年代末，香港經濟大大改善，原因之一，是政府巧妙地利用了那大量來自中國內陸的廉價移民勞工。五十年代時，香港的工廠由三千增至一萬間。生活指數雖然上漲，工資卻保持低廉。透過政府、不同的信仰團體和慈善機構的不斷努力，市民的居住、教育和醫療方面的需要都得到照顧，難民已不需要緊急的援助。一九六七年，在跑馬地及銅鑼灣開辦的聖瑪加利大夜校被關閉，翌年，設於大坑道及堅尼地城的明愛診所也相繼停辦。

⁴¹ Gheddo, 140

第十五章

歷史里程碑

一九六八年是修會在香港的一個里程碑。首批法國修女來港傳教一百二十年後，一位中國籍修女被委任為香港省會長，她是張佩瓊修女（Mother Marie Isabelle Tchang）。她原籍中國雲南省（Yunnan Province）昆明縣（Kunming），修會於一九一一至一九五一年曾有修女在那裡服務。張會長秉承貝克維會長推行慈善工作的原則和計畫。九龍藍田是一徙置區，很多新移民在那兒居住，他們的子女極需一所學校，為他們提供教育。一九七〇年，第三間聖保祿中學在藍田（Lam Tin）啓幕，被委任為校長的是一位剛由英國修業回港的年青修女——王德蘭修女（Sr Marie Pauline Wong），她更將會領導香港整個團體。



一九七〇年啓幕的藍田聖保祿中學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眾多重大的改革中，禮儀方面的革新對一眾信徒的公開敬禮影響至深。感恩聖祭沿用的拉丁語，被本地語言取代，主祭的神父也改為面向教友。為慶祝修會在香港傳教一百二十五週年紀念，基督君王小堂在一九七三年三月進行了大規模的裝修，半圓拱形屋頂及祭台部份被完全改裝。為配合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禮儀改革，領聖體欄杆被拆除，一座簇新的祭台被放置在中央，祭台下方前面有一塊最後晚餐的美麗雕刻，祭台兩側的地面被增高五級，

好使整個新祭台與舊祭台的高度一致。

聖堂其中一個特色是朝向祭台的彩色玻璃窗，那是保祿姆姆留給我們的美好之物，她不單對窮人富於仁慈憐愛，對上主的殿宇更充滿熱誠膜拜之情。為聖殿，她豪不吝嗇，每一事物須是最美好的，那包括祭台的裝飾、祭台布、花瓶、苦路聖像等等。在香港找不到，她會到上海、澳門，甚而巴黎搜尋。她親自佈置祭台，她的插花藝術無人能媲美。

最初，聖堂為修女專用。一九六一年，「聖瑪加利大堂」(St. Margaret's Church) 的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容達榮神父 (Fr John Pittavino)，要求在主日使用聖堂舉行特別的兒童彌撒，漸漸地，更多的人參與彌撒。後來，在修女及主教的同意下，堂區獲准在聖堂為信眾舉行主日彌撒。聖堂深受堂區歡迎，因堂區空間不足，未能容納數日日漸增多的教友。不過，由於它是一私人小堂，故不能在那兒舉行婚禮。聖堂能容納近乎一千人，故教區及其他天主教機構也常因特別的慶典而借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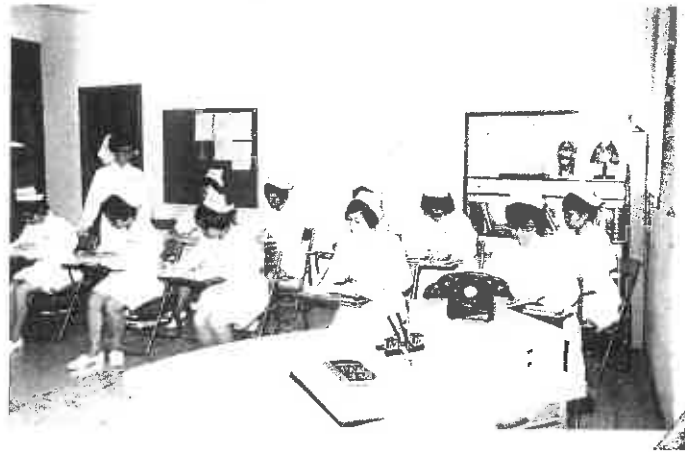
九龍聖德肋撒醫院很快也不敷應用。香港人口不斷增多，使醫院的收容量達至極限。一位法籍護士修女這樣描寫醫院忙碌的一天：

一天，我們接收了四十七名病人……他們中間有些很富有，有些卻是很貧窮的；有些是遊客，有些卻來自徙置區！但全都為獲得照顧及治療而來。他們都是病者，健康欠佳，沒有活力！我們費了很多的時間及愛心，陪伴他們，送他們到不同的病房，幫助他們安睡床上，使他們明白他們定會獲得良好及迅速的護理，因為每一位護理員都深切關懷他們，我們將盡力給予他們悉心的照顧，因為這對他們的康復是很重要的。⁴²

不久，醫院準備加建。但一九六六年及一九六七年所發生的暴動使人感到不安，醫院管理層對這計畫也抱有存疑；他們深恐左派份子引發更大的騷亂，或更使人擔憂的，是共產政權的入侵。北座及西座的擴建工程因而被擱置，只進行了很小的維修工程。後來社會慢慢回復正常，擴建工程也隨而正式展開，一九七一年醫院新翼落成。開辦一所護士學校是醫院很多醫生不斷的渴望，當時的醫院院長艾蘭德修女 (Sr Marie Noel Aranda) 開設了一所先創的護士學校，主要收納中三至中五的學生，培訓為助理護士。一九六九年四月，十二位學護開

⁴² Cecilienne Huard, *Give and Take*, No. 2, November 1968, p. 15

始了培訓課程；至一九七四年，獲香港護士管理局正式承認為護士學校，那時最低的收生標準需中五畢業。在護士學校畢業後，他們是登記護士，這有助他們繼續進修，成為註冊護士。至一九九八年，完成兩年制課程的，已有四十八組護士學生了。



一九六九年聖德肋撒醫院護士學校開學

一九六〇年初，貝克維會長在孤兒院的設施方面，作了顯著的改革。當「社會福利署」(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為不同機構培訓員工，而開辦幼兒護理課程及急救課程時，我們也有三位修女參加。這些進程使孤兒院兒童的存活率得以提升。有能力修讀的孤兒，修女們都鼓勵他們完成中學課程，好使他們離開孤兒院後，能繼續接受職業培訓，有一技之長。有一些長大後結婚，組織自己的家庭。

有一些卻因不平衡的情緒和心理的困擾，雖經修女們多方面的幫助，仍未能投入社會；有很多嘗試出外尋找工作謀生，卻不停地轉職，最後重回孤兒院。這時，修會的兩所醫院成為他們投入社會的踏腳石，他們先在醫院工作，取得經驗及適應後，再重投入社會謀生。

更有一些能與父母相認，領回撫養；有一些則為本港或海外人士所領養，他們被領往美國、英國、澳洲及紐西蘭等地，在疼愛他們的養父母照顧下，開始生命的新一頁。



一九六四年 育嬰院照顧在職母親的嬰兒

香港逐漸發展成爲經濟穩定的現代大都市，人民的教育水準及生活質素漸漸提高，整個社會的現象不斷改變。生活得到改善，拋棄嬰兒的情況也大爲減少。另一社會需要隨而誕生，很多婦女爲幫補家計出外工作，留下子女在家中；這類孩子數以千計，四處游蕩，他們居住在擠迫的房間裡，一清早便跑到街上，整天乏人照料，因母親們都往工作去了。因此，日間托兒中心極爲需要。

一九六三年二月，香港省議會申請把孤兒院轉爲日間托兒所時，這樣描述：「已沒有孤兒留下了，他們都被送往美國及澳洲，等待加入領養的家庭。社會福利署很歡迎這個計畫，他們也會來探訪。我們因要提供奶粉，故獲准收取每孩童每月二十元。我們也可給予免費…不過，我們再不能爲嬰兒付洗。我們設法尋找良好的天主教家庭領養我們的孤兒，尤其是政府正建設育嬰院接收被遺棄的嬰兒。」翌年，香港政府在竹園（Chuk Yuen）（即現今的黃大仙 — Wong Tai Sin）爲被遺棄的嬰兒開辦了一所「兒童接待所」（Children Reception Centre），所有私立孤兒院都歸社會福利署管轄。爲響應父母們因工作而帶來的需求，及更好善用孤兒院的設施，例如操場及花園等，聖保祿育嬰院於一九六四年九月，停止接收棄嬰，轉型爲一所日間托兒所。由於仍餘下八十九名孤兒及二十名傷殘病弱者，故托兒所命名爲「聖保祿孤兒及育嬰院」（St Paul's Orphanage and Creche）。「育嬰院於上午八時開門，接收嬰兒，他們將給予餵奶、清潔及看顧，下午六時，被接回家中。」

孤兒的人數持續下降，引致孤兒院於十年後的另一改革。一九七五年，只有四十二名孤兒需要修女的照顧，對這些孤兒來說，孤兒院就是他們的家，他們唯一熟識的地方，修女們也竭盡所能，繼續照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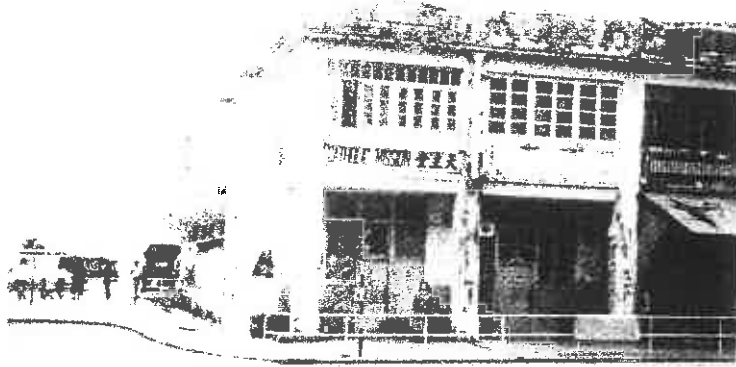
他們。一九五四至一九六一年間，政府籌畫一龐大的教育方案，創造超過三十萬個新的小學學額；那時，小學教育雖不是免費的，但已有99.8% 適齡學童入讀小學。⁴³ 家長們非常著意他們的子女能否進入優秀的小學，為此，學前教育成爲流行及緊急的需要。

學前教育雖未被劃入正規的教育政策內，但在家長及教師的心中，卻一直是、將來也是，與小學教育緊密並行的。⁴⁴

爲配合社會不斷的進步，及對幼兒護理知識不斷提昇的情形下，政府也同時不斷改變社會福利的政策。⁴⁵

修女決心適應社會的新境況，孤兒院也因此逐漸轉變，一九六四年轉爲一所日間托兒所，一九七五年更轉型爲一所幼兒學校，前後歷經一百二十七年的變更。「聖保祿幼兒園」提供全日制的學前教育，準備幼童進入小學教育，仍屬社會福利署管轄。

追溯一九六一年時，貝克維會長於大埔開辦了一會院，名爲「天主堂」(Catholic Mission)，屬於教區所有，修女們在那貧困的地區幫助有需要及不幸的人。



大埔「天主堂」

「那半是郊區，半是沿海地區，並排著的舢舨就是居住的地

⁴³ Wikipedia, "1960s in Hong Kong", http://en.wikipedia.org/wiki/1960s_in_Hong_Kong

⁴⁴ Emma Pearson and Nirmla Ra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olicy reform in Hong Kong: challenges in effecting change in practices", CNet Networks,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qa3614/is_200601/ai_n17174789

⁴⁵ Frederick Cheu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in Hong Ko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Ritsumeikan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Beppu, Oita, Japan: Ritsumeikan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November 2007, Vol 23), pp. 89-98

方。修女們首先居住在一曾是店鋪的房間，當『聖母無玷之心堂』（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hurch）落成，神父有了新的居所時，舊的神父居所便成了修女的住所。」⁴⁶



大埔 一位修女與難民

修女們猶如始創時的樂維威修女，探訪貧病者。她們帶著和藹的笑容，慈祥的慰語，探訪居住在木屋區及舢舨裡的貧民。教授他們要理，更開辦了一所細小的診所，名為「海星教理室及診所」（Stella Maris Catechumenate and Dispensary）。

翌年，堂區開辦「聖母聖心小學」（Sacred Heart of Mary Primary School），梁志修修女（Sr Stanislaus Leung）出任校長。前任本堂司鐸、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桑得嵐神父（Fr Narciso Santinon）這樣描述堂區及學校開始的情況。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三日，我來到大埔履行司鐸的職務。那時…唯一的通路——廣福道（Kwong Fuk Road），一邊為海旁，另一邊是漁艇及濕漉漉的草地，居民約數萬。在聖堂範圍、聖堂旁及神父宿舍等地，可騰出的空間，是三間形狀不規則的課室及一細小的操場。我就是利用這些地方來開始我們的「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Sacred Heart of Mary Catholic Primary School）…。我們獲得教育署的批准，更難得的，是有一位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的修女願意出任校長。一九六二年九月，學校開學，只有十七名一年級學生。在下學期，二年級也開始了，有七位學生。後來，每年增添一新班，直至六年級。

⁴⁶ Bord, 80

學校首七年是私立小學，學生每月學費八元。教師薪酬微薄；後用社會福利捐贈的麵粉和油製造麵飽，每個售賣五仙，藉著所得的微利，才能把教師的薪酬略為提高。但社會福利的捐贈於一九六九年停止，學校也於此時由私校轉為津貼小學。⁴⁷

一九七一年，張佩瓊會長在大埔墟（Taipo Market）買了一所兩層高的房子，修女也由天主堂遷入新址。地下的一層闢作診所，名為「海星診所」（Star of the Sea Clinic）。一九七五年九月，在眾多需外出工作的母親的懇求下，修女把部份診所地方轉為一日間托兒中心，收納二至四歲的兒童。

香港開埠初期，一直是由私人的慈善機構，推行援助貧苦及有急需服務的工作；至六十年代末，政府才逐漸肩負為市民提供社會福利服務。隨著私人及政府開辦的診所增多，習慣採用中醫療病的中國人，也漸轉向西醫治病。⁴⁸ 因此，大埔的診所也於一九七六年四月結業，整座房舍轉為幼兒園，改名為「天主教聖保祿日間托兒所」（St Paul's Catholic Day Nursery），與銅鑼灣的幼兒園相似，同樣為二至六歲的幼兒準備學前教育。

由於符合資格的修女不足，一九七〇年末，兩所小學的行政工作交回教區負責——一九七六年退出大埔的聖母聖心小學，一九七八年退出堅尼地城的聖嘉祿學校。但在深水埗聖老楞佐堂的牧民工作則繼續至一九七九年，當其中一位修女需要退休，修會在那裡的堂區工作也便結束。陳順金修女（Sr Rosalie Chan）卻仍於每星期日，恆心地由銅鑼灣乘搭巴士往深水埗，探望教友及教授要理，直至八十年代。

⁴⁷ Narciso Santinon, "30 Years", *Hong Kong Paulinian Newsletter*, No 143, June 1992

⁴⁸ Robin Gauld and Derek Gould, *The Hong Kong health sec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47

第十六章

銅鑼灣的變更

貝克維會長一直渴望為修女提供充足的支援，不單為傳教工作，也為修女本身的福利及安康，但這意願卻待至她的繼任人張佩瓊會長才得以實踐。「聖保祿修院」(St. Paul's Convent)於一九七五年落成，是省會的行政總部，也是年老病弱獲照顧或退休修女的安居之所，更有充足的房間作修女退省之用。這所新建的大樓給予修女更大的空間及寧靜，有助修女投入祈禱的氣氛。修院內有小聖堂，對年長修女的幫助很大，每天的彌撒和早晚祈禱，她們再不需跑往大聖堂，更可免卻風雨天帶來的不便。

多年以來，聖保祿醫院的醫生請求擴充醫院，因太擠迫了；他們也明白，在當時的經濟環境下，那是不可能的。四年後，這等待已久的擴建工程終獲羅馬修會總議會的批准。一九七四年，聖母產科醫院一醫院的婦產科部門被拆卸，騰出空間建造一幢簇新及現代化的醫院大樓。這是醫院新翼，於一九七六年九月六日，由港督麥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主持揭幕禮，胡振中主教(Bishop John Baptist Wu)祝聖；病床數目由一百八十張激增至四百張。

一九七六年，聖保祿學校校長兼校監依撒伯爾·天神修女(Sr Isabel of the Angels)申請並獲准改建校舍。原屬香港棉紡織染公司的兩座舊校舍，是一八九九年的建築物，主要以木建成，現已被白蟻侵蝕，牆壁也出現裂縫。

重建銅鑼灣學校是三項學校重建計劃中的首項，也是張佩瓊會長任內最後批准的工程；繼承她的是高慧儀會長(Mother Lucie Ko)，一九七八年二月，高修女被委任為省會長。新的省會長年輕有為，魄力充沛，她監察這龐大工程的進行，一座現代化的新校舍便在銅鑼灣落成。



於一九七九年被拆卸的舊校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六日，前學校禮堂成爲第一座被拆卸的建築物。出席當天拆卸儀式的人士，心中感受良多。港督麥理浩夫人（Lady MacLehose）主持拆卸儀式，二十年前，她曾是該校的教師。對那曾在這座超過六十三載歷史的校舍進出的千萬學生眼中，它是神聖摯愛的，它的消失，好像一個朝代的沒落，伴隨著它的歡樂時光，也只好被埋在默默的記憶中了。

一九八一年九月，新校舍開始啓用，新的使用者——學生與老師們充滿著興奮的心情和期望。修女與學生們儘管對舊校舍仍依依不捨，卻也欣喜能遷進新校舍，因不需再與發聲的地板和帶有裂縫的牆壁爲伍了。除了課室外，還有一座樓高三層的禮堂及一個長二十五公尺的游泳池。



於一九五一年建於禮頓道及銅鑼灣道交界處的學校禮堂

緊接著的是小學部的重建，工程於一九八三年完成，新校舍隨即投入服務。

跟著便是拆卸舊有的孤兒院及幼兒園。新院於一九八五年落成，那是一所七層高的大樓，包括「聖保祿女子宿舍」(St Paul's Home for Girls)、聖保祿幼兒園及聖保祿學校的幼稚園部等，幼稚園改名為「聖保祿幼稚園」(St Paul's Kindergarten)，各有獨立的校長，兩所學前教育園地都是為學生準備進入小學一年級。聖保祿幼兒園屬社會福利署管轄，是一所四年全日制的學習園地，收錄二至六歲的幼童。聖保祿幼稚園則屬「教育署」(Education Department)管理，是一所三年半日制的學校，收錄三至六歲的兒童。



於一九八三年拆卸的舊孤兒院

一九八六年，香港政府的「教育統籌委員會」(Education Commission)建議把兩類學前教育合併。省議會及會院管理層也曾認真考慮其可行性，最後，為符合家長不同的需要，決定維持兩者並行。直至現在，這兩類學前教育仍在香港流行。

兩者的目的…迥然不同。幼兒中心(日間托兒所)的出現，純粹幫助父母需全日外出工作的家庭，照顧他們的子女…，幼稚園…是為學生應付進入小學的甄別試，家長為幫助子女通過入學試，把子女送進幼稚園…。雖然這些目標已隨著時間而改變，

但兩類學前教育的分別仍存在。⁴⁹

修女在銅鑼灣、跑馬地及大埔所管理的四所學前教育，不論是幼兒園或幼稚園，都達到很高的學前教育水準。跑馬地的幼稚園曾於一九五八年結束，一九六七年重開，羅海倫修女（Sr Helena Noronha）出任校長，她常被暱稱為「海倫姆姆」（Mother Helena），她於一九七二年退任。海倫修女在修會內曾肩負多項重要的任務，包括初學導師及省議員。多才多藝的她，從事教育工作的時間雖短，但對學前教育的貢獻卻不少；她富有創意和勇毅，提出兩項反傳統的教學意識：「不要功課，不要考試」，及推行「初級字母教授」（ITA, Initial Teaching Alphabet）；這些都是教授英語的全新模式，在此之前，香港沒有一所幼兒學校作此賞試。在當時，「初級字母教授」是創舉，卻很成功，深受教師及家長的欣賞和歡迎。

因學校廣受家長愛戴，申請入讀人數眾多。入學申請表格常於指定的日子派發。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派發表格的日子，一件意想不到的悲慘事發生了！那天，跑馬地聖保祿天主教小學幼稚園部派發入學申請表格，一清早，成人與兒童在跑馬地黃泥涌道（Wong Nai Chung Road）列隊等候；瞬息間，一架雙層巴士突衝入人群，引至六人死亡，八人受傷。這悲劇不單震撼了死傷者家人的心靈，對幼稚園的校長和老師也是難以磨滅的創傷。事實上，人們不用列隊等候，因每人都會獲派一份表格。為了減輕死傷者家人的痛苦，他們的子女都被安排入讀銅鑼灣幼稚園，而不在跑馬地幼稚園入學。

六十年代末期，香港進入電腦科技的紀元。最初採用的是私人機構，至八十年代初期，教育界也開始使用了。跑馬地聖保祿中學首先推行電腦科，是香港教育界電腦教育的先鋒；兩年後，香港教育署才在學校推動電腦的學習。當時聖保祿中學的校長黃金蓮修女（Sr Margaret Wong），是熱衷推廣開創新科技的教育者之一。一九八一年，她獲得「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的贊助，設立了學界首個電腦室，為中四學生開設電腦學科。黃修女對推動教育及社會服務的貢獻，獲得讚賞，一九九七年，她獲頒發大英帝國勳章（Member of the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同年，一位聖保祿學校舊生，名導演許鞍華女士（Ann Hui），同獲頒發大英帝國勳章（MBE），跑馬地聖

⁴⁹ Sylvia Oppen, "Comparison of certain structural and organizational features of Hong Kong kindergartens and nurseries", <http://sunzi.lib.hku.hk/hkjo/view/36/3600007.pdf>

保祿中學校長黃葉慧瑩女士 (Mrs Diana Wong) 也獲頒發榮譽勳章 (Badge of Honour)。一九七三年，聖保祿學校校長祁玫瑰·瑪利修女 (Sr Rose Mary Clifford)，於學校服務了十八年，也在獲頒大英帝國勳章 (Queen's Honours MBE) 之列。另一位多才多藝、在「香港學校音樂節」(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歷史留下英名的，便是賈美蓮修女 (Sr Carmela Santos)。她在聖保祿學校及「藍田聖保祿中學」(St Paul's School, Lam Tin) 所培訓的歌詠團，達至很高的水準，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八〇年間，獲得超卓的聲譽。

成立「聖保祿之友」(Friends of St Paul)，是高慧儀修女後期所推動的項目之一。遠在一九一六年，日本省會把修女的親友聚合，組織成一個團體，名為「聖保祿之友」；其他省會未能迅速效法，至六十多年後，加拿大省會才成立自己的小組。在香港，一九八九年初，高修女與十三位女士聚會，她們大多是聖保祿機構的成員。她們每年許諾，願意遵守團體的指引及會規。她們每兩個月聚會一次，透過祈禱、分享，加深信仰及對天主的愛，更希望效法聖保祿的精神。她們也組織一些宗教性和服務社區的活動，及參與修女為香港及中國內陸貧困者的外展計畫。

第十七章

不明朗的明天

修女的宗徒工作一直是獨立的，不是由教區安排；這引來一些本地神職人員的意見，他們感覺修女在牧民工作上與教區的合作不足，當然，這並非事實，因為自六十年代始，修女便在大埔、堅尼地城、深水埗等地，默默地在堂區服務。無論如何，高修女於一九七九年，決定派遣暫願修女在週末往香港、九龍，甚而遠至新界的多個堂區工作；可惜，十年後，聖召式微，暫願修女人數下降，在週末往堂區協助的工作也減少了。

一九八九年，當王德蘭修女被委任為省會長時，便面對這個困難。修女人數雖短缺，她仍讓有意服務堂區的修女，在堂區負起全職牧民的工作。這時，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所引起的影響，特別有關神職界及修道團體方面，逐漸浮現出來。一九六五年大公會議結束，隨後數年，很多天主教信徒都面對極大的危機；全球明顯聖召銳減，神職界及修道團體則出現還俗潮。

在香港，這股衰退的激流，更因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而變得複雜及惡化。自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簽下「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後，香港人便要面對未來的政治動向。自此，事情無論大小、私人性或社會性，都不免與一九九七回歸這問題扯上關係。社會受到極大的震盪，掀起前所未有的移民潮，移民數字高企，鄧小平（Deng Xiaoping）提出的「一國兩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理念也阻遏不了。

本雅明會長在一八五九年面對危機，為修女的將來而作出應變，往澳門及越南尋找新的發展地，這情況再次重演；香港正面臨歷史性的轉捩點，為保障修會的安全，作出了新的措施。一九八四年，高會長開始籌畫在澳洲摩士圍（Moss Vale）開辦一所學校。首三位修女於十月離港前往新的傳教地。

教會內的改革及香港社會的不穩定，引來混亂不安的情緒，這可從修會聖召及修女數目不斷下降的情形顯現出來。由於加入初學院的人數萎縮，在上水的「聖保祿初學院」（St. Paul's Novitiate）也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關閉；五年後才在銅鑼灣重開。

聖召短缺打擊了修女的宗徒工作及傳教活動。因而被關閉的不單是修會的機構，會院團體也未能倖免；一些聖保祿機構的管理層也不能再由修女出任，改由在俗人士擔當，一九九六年，聖保祿醫院及聖德肋撒醫院的醫務總監工作，分別由方心讓爵士（Prof Sir Harry Fang）及周寶煌醫生（Dr Christina Chow）接管。方教授在傷殘復康界中享有盛名，是不遺餘力的先驅者；周寶煌醫生則活躍於香港明愛的工作。

不幸被削減的修會服務，包括了跑馬地的幼稚園部、商科部及銅鑼灣的商科部。銅鑼灣聖保祿學校及跑馬地聖保祿中學的商科部，為未能進入大學的中學畢業生提供高等教育，已有半世紀之久。這兩個享有盛名的商科部，培訓了數以千計能幹、備受讚賞的秘書及辦公室職員，有些更藉此而晉陞管理階層；這成功全賴姬瑪利·聖心修女的努力和功勞。

在各方面衰退的環境下，一個新的服務需求卻逆流誕生。一九九三年一月，聖保祿學校開辦了「澳州國際書院部」(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Section)，取錄兩班第七班（Year 7）的學生，共約二十人。這是為幫助我們修會在澳洲摩士圍的「震旦書院」(Aurora College) 栽培學生，修女在澳洲開辦了一所只有第十一及十二班（Years 11-12）的高校。澳州國際部是為移居國外的澳洲籍學生，及準備移民澳洲的香港家庭子弟，故採取了澳洲中學第七至第十班的課程，教師有澳洲籍及華籍。一九九八年，校名改為「國際書院部」(International Section)，課程也加以擴展，包括「國際中學文憑課程」(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GCSE)，這是「英國劍橋大學考試局」(Cambridge University Board of Examinations) 為中四及中五而設的兩年課程。

第十八章

喜慶之年

王德蘭省會長任期開始時，香港雖因將回歸中國主權而人心惶惶，對前境感到一片灰暗，但修會在首千禧年最後的十年裡，卻充滿著喜慶歡樂。

一九九六年，全球聖保祿修女齊慶祝修會在法國樂維威創會三百週年慶典。在香港整年的慶祝於一月展開，胡振中樞機主教（John Baptist Cardinal Wu）主持感恩聖祭，港督彭定康（Christopher Patten）及夫人（Mrs Lavender Patten）為「禧年展覽」啓幕。四月舉辦了三百週年紀念綜藝晚會，蒙政務司長陳方安生女士（Mrs Anson Chan, Chief Secretary）蒞臨參與，她曾於聖保祿學校修讀中六及中七。六月時，銅鑼灣、跑馬地及藍田三間聖保祿學校的舊生會，籌備了一個慶祝三百週年紀念的晚宴。九月十二日為修會抵港紀念日，是日在「聖彌額爾墳場」（St Michael's Cemetery）舉行感恩聖祭，紀念一眾已亡修女，主祭為巴黎外方傳教會香港會長呂德能神父（Fr Emile Louis-Tisserand）。



修會創會三百週年紀念感恩聖祭 胡振中樞機、陳日君主教、湯漢主教
及多位神父共祭（一九九六年）

一九九八年，修會慶祝在香港傳教一百五十週年。在四月籌備了多項活動，計有感恩聖祭、綜藝晚會及晚宴。修女們喜樂地，感謝天主賜予奉獻的聖召，能在香港以愛心服務一百五十年而感恩。總會長

奧安瑪利修女 (Mother Anne-Marie Audet)、越南、日本、韓國、泰國及菲律賓等地的省會長，蒞臨分享這慶典的喜悅。作為修會的第二個傳教站——香港也是這些地方的發源地。修女多年悉心照顧的孤兒沒有被忘懷，在六月為他們安排了感恩聖祭及聚餐，他們攜同家眷近百人出席參與。

一九九八年終，舉行了另一大慶典，聖保祿醫院慶祝建院百年誌慶。慶典的開幕禮嘉賓雲集，幸蒙香港特首董建華先生 (Chief Executive Tung Chee Wah)、特首夫人董趙洪聘 (Mrs Betty Tung)、胡振中樞機、陳日君主教 (Bishop Joseph Zen) 及湯漢主教 (Bishop John Tong Hon) 的蒞臨。醫院也為醫生及醫務人員們，舉辦了一個名為「邁進新千禧後的治療及護理」(Healing and Care into the Next Millenium) 科學會議；獲邀的嘉賓講者中，有一位是來自菲律賓聖保祿修會的萬依華修女 (Sr Eva Fidela Maamo)，她是一位外科醫生，於一九九七年獲頒「麥西西獎」(Magsaysay Award)，以表揚她為貧苦者的服務和貢獻。在這次會議中，她的講題是「修道團體在醫療服務的角色」(The Role of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in Health Care)。此外，院方也安排了十二位醫生，為市民大眾舉行免費醫療講座及身體檢查，並推出價值一千元的體檢套票，作為幸運抽獎的獎品。

回顧修女在一九九八年的宗徒工作，發現修女人數雖減少，卻仍能在教育、醫療、社會福利及福傳等多個範圍服務市民。修女大部份的愛心工作集中在銅鑼灣，那兒有聖保祿學校的三個部門 (小學、中學及國際部)，兩所學前教育 (聖保祿幼兒園及聖保祿幼稚園)，聖保祿醫院及聖保祿女子宿舍 (前身是孤兒院，現仍有十一位已高齡的孤兒)。在跑馬地有聖保祿中學及聖保祿天主教小學，在九龍有聖德肋撒醫院及護士學校、藍田聖保祿中學，在大埔則有「天主教聖保祿幼兒園」(St Paul's Catholic Day Nursery) 等。修女們秉承基督的救贖使命，在學校、醫院裡臨在和延續服務，提昇人們的宗教熱忱，不單學生和病人受益，其他職務人員也裨益不淺。滿懷虔誠奉獻的心，她們忠信地培育首四位法國傳教修女在香港土壤所播下的愛德種子。

香港政府曾把聖德肋撒醫院背後，位於露明道 (Lomond Road) 的一塊空地給予修會，擴建大樓的工程卻一直延遲，十六年後，這工程才真正展開。由於當時的經濟資源不足、聖召缺乏等因素，計劃一直擱置，至一九九三年才正式申請使用那塊土地。政府給予的只有兩個選擇：接受或放棄，這使醫院雖面對一很不明朗的未來，也願意接受那風險。修女對香港能跨越一九九七年回歸的挑戰，仍抱有很大的信

心，再者，醫院已非常擠迫，全無改善及發展的空間。政府於三年後才正式批准修會的申請，並附帶一條件，在新建的大樓內，須有慈善的服務。

四位法國修女踏足「荒蕪」的香港一百五十年後，仍在香港的外籍傳教修女，只有一位法國及兩位菲律賓籍修女。魯瑪利·奧古斯修女（Sr Marie Auguste Roue）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抵港，在香港已有六十九年。她對傳教的熱誠，尤其對中國人的愛護，是她恆心堅忍的秘訣。她對首次參加的感恩聖祭，仍有濃烈的憧憬：

那天是獻聖母於主堂紀念日，我懷著極大的喜樂，這是一很清晰的標記，我將偕同聖母在香港奉獻我自己。…每天在舊的英法學校地下為會院團體奉獻感恩聖祭，銅鑼灣的所有修女在此參與聖祭；基督君王堂剛建成，還未能使用。我們人數眾多，頗擠迫，那時冷氣機仍未出現，這不就是我們全都願意接受的傳教生活嗎？包括一位剛抵步的修女，我們都很快樂！

一九九一年，八十八歲的魯修女接受了訪問，有趣地描述一些她在聖德肋撒醫院退休的生活片段。

每天早上八時，即使是星期天，我由一個病房走往另一病房，向每一位病人說：「早晨！」並向他們慰問，臉上掛著的是最美麗的笑容。有些日子，我常常抽空為他們做些微的服務，因為中國籍的病人…，多不願意為瑣碎的事而按鈴，雖然我已重覆地說那些鈴是為他們而設的。向我說口渴的人，我為他們送上水，有些則喜歡多一張毛毯，有些卻說棉被太重了…等等…等等。

對那些將要被送往手術室的信徒，…我邀請他們及焦慮的家人與我一同祈禱。若病人願意，我便為他們邀請一位神父或牧師到來。對心裡充滿煩憂的家人，我耐心地聆聽，分擔他們的憂慮，…帶他們往聖堂，…他們可隨意在那兒祈禱。⁵⁰

醫院裡有待探訪的病人不下數百，魯修女每天都很多姿多采。

一九七〇年後仍繼續的工作，一九九八年更蓬勃起來。回顧整段悠長的歷史，成就中不免帶著不少的眼淚與辛酸。猶如聖保祿——她們的主保，修女們也經歷了嚴峻的考驗和痛苦：疾病、死亡、誤會、

⁵⁰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Hong Kong Paulinian Newsletter*, No. 136, July 1991

被驅逐的恐懼、破壞等。她們與香港一起，分沾香港的精神，從困難、障礙中站立起來，跨越挑戰。聖保祿的說話是她們最好的寫照：「若是天主偕同我們，誰能反對我們呢？」她們滿懷對天主引領的信賴，邁向未來。天主將指引她們追隨祂的旨意，延續培植先驅修女一百五十年前在香港土壤播種下的仁愛樹苗。

第十九章

海外的發展

一八四八年，在中國眾多的修會中，人數最多的要算是法國傳教士，尤其是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會士。自十七世紀始，他們已是教會在遠東福傳的先驅。⁵¹ 他們無論走到那一個地方，都邀請聖保祿修女予以協助和服務，因此修會能迅速地在亞洲發展。

內心充滿傳揚天主喜訊的熱忱，修女放眼香港以外的世界。早於一八九九年，修女已翻山越海，在中國內陸拓展傳揚福音的工作。可惜的是，全部會院及宗徒工作，都因戰爭及政局的動盪而被迫捨棄。一九九六年，與韓國省會合作，嘗試再次進入中國，兩位韓國修女成功進入北京。現在，中國、台灣及澳洲同屬香港省會。

一九四九年，期望在較多天主教家庭的澳門找到聖召，及害怕共產勢力進一步控制香港，修女決定在澳門成立一會院。「聖若瑟會院」(Casa San Jose) 是一退省及休閒的處所，也是一所孤兒院及難民的藥房。直至一九五四年，一些年輕的修女抵達，在「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 的護士學校修讀課程。

其實，這並不是修女第一次嘗試在澳門推進福傳工作，澳門是修女在香港以外的第一個考慮點。修女初抵香港六年後，惡劣的環境及疲勞的工作奪去了兩位修女的生命；那時，第三位院長雷絲·莫斯修女便曾在澳門租賃一房子，那兒因氣候對健康有益而著名，疲累或病後待復原的修女在此休養。一八五九年，飽受攻擊的本雅明姆姆害怕修女被逐出香港，被迫跑往澳門，尋找棲身之所。最初開辦的是孤兒院，一八六四年，一所免費的寄宿學校也投入服務；很不幸，在澳門的宗徒工作經歷多次的關閉及重開，最後在一九六七年因政治動盪而完全撤離。

本雅明姆姆除了前往澳門，也於一八六〇年往赴越南，希望能展開修會羽毛未豐的翅膀，把福傳的工作，帶往香港以外的地方。這真是傳教工作上一項重要的嘗試，奠定了以後更多的努力和成果。越南成爲整個修會的福傳樞紐，一批一批的修女被派往各地：一八七八年往日本，一八八八年往韓國，一八九八年往泰國，及一九〇四年往菲

⁵¹ Ryan VII

律賓。而菲律賓的傳教修女，相繼在三大洲開發了不少的傳教站：計有印尼、東帝汶、美國、以色列、秘魯及哥倫比亞；而韓國的修女也於一九九六年在蒙古開始了工作。

修女在香港的成就，不能與香港在修會的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相比。二十世紀初，「這些英勇的修女，全戴著白色的頭巾（coifs），就像軍隊的先鋒。現在，人們可在交趾支那（Cochinchina）、安南（Annam）、東京（Tonkin）、中國（China）、日本（Japan）、韓國（Korea）、暹羅（Siam）、寮國（Laos）、及菲律賓群島（Philippines Islands）等地看到她們；這支軍隊種下的不是死亡，而是永恆的生命。」

香港是通往各地的樞紐。修女在亞洲的擴展是修會的祝福，因為一百五十年後，大部份的修女已是亞洲人。現在，越南、菲律賓及韓國不斷派出傳教修女，往新的或已建立的傳教地，甚至往法國沙爾德母院。

懷著感恩的心回顧過去，展望將來，沙爾德聖保祿修女效法她們的前人，繼續散播天國的種子，祈望這些種子茁壯、開花、結出豐盛的果實。聖母常是修女們的典範，特別是她對聖神的順從，對天主完全的交付；共同創會人迪瑪利·安娜姆姆的說話：「把自己獻給天主，為教會的益處及服務人群」，綜合了她的一生，也是修女秉承的精神；這也是修女的神恩，實踐於教導無知者和護理病弱的人身上。

修女的神修是以基督為中心。她們效法聖保祿（St Paul）——她們的主保，與他一起說：「為我，生活原是基督。」（斐一：二十一）回溯修會在香港的發展歷程，可以肯定的是，修女所有的成果，是她們以基督為中心的神修的表達，也就是「對基督的摯愛，及對傳佈福音的熱忱」的實踐。

附錄

會院院長

1848-1850	雅芳善·科嘉姆姆	Mere Alphonsine Forcade
1850-1854	聖瑪素姆姆	Mere Ste Marcelle
1854-1859	雷絲·莫斯姆姆	Mere Louise Morse
1859-1861	本雅明·諾爾·古斯姆姆	Mere Benjamin le Noel de Grouss *
1861-1863	安博·綺芳姆姆	Mere Ambroise Yvon
1863-1872	瑪利·董尼奧	Mere Marie de la Conception Doniau
1872-1891	保祿·十字·庇雅姆姆	Mother Paul de la Croix Biard

省會長

1891-1926	菲力斯·佐頓姆姆	Mother Felicie Jourdan
1926-1935	瑪加利·聖保祿·盧斯姆姆	Marguerite de St Paul Nuss
1935-1947	聖沙勿略·維美斯姆姆	Mother St Xavier Vermeersch
1947-1954	保蓮·費格姆姆	Mother Pauline Figus
1954-1960	德蘭·聖若瑟·安迪奧姆姆	Mere Therese de St Joseph Andrieux
1960-1968	納德·貝克維會長	Mother Bernard de Marie de Broqueville
1969-1978	張佩瓊會長	Mother Marie Isabelle Tchang
1978-1989	高慧儀會長	Mother Lucie Marie Ko
1989-2004	王德蘭會長	Sr Marie Pauline Wong
2004-	何美蘭會長	Sr Marie Jacqueline Ho

* 於一八六一年被委任為首席院長，駐守越南西貢，同時管理越南、香港及澳門。

參考書目

- Bord, Marie Paul. *In China*, trans.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1996.
- Bord, Marie Paul. *Mother Benjamin le Noel de Groussy*, trans.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 Cheung, Frederick.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in Hong Ko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itsumeikan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Vol 23 (November 2007)
- Clarke, NM. *The Governor's daughter takes the veil, Sister Aloysia Emily Bowring, Canossian Daughter of Charity*. Hong Kong: Canossian Missions Historic Archives, 1980.
- Gauld, Robin and Derek Gould. *The Hong Kong health sec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Gheddo, Piero. *Lawrence Bianchi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92.
- Gobillot, Rene. *The Sisters of Saint Paul of Chartres*, trans. Manila, 1956.
- Granelli, A, "The Bumper Harvest", in *Catholic Hong Kong, A Hundred Years of Missionary Activity*. Hong Kong: Catholic Press Bureau, 1958.
-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inutes of the Meeting." 7 October 1909.
<http://www.legco.gov.hk/1909/h091007.pdf>.
-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Minutes of the Meeting." 3 December 1914,
<http://www.legco.gov.hk/1914/h141203.pdf>
-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ast and present*. Hong Kong: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1993.
- Huard, Cecilienne. *Give and Take*, No. 2, November 1968
- Le Pichon, Alain. *Bethanie and Nazareth - French secrets from a British colony*. Hong Kong: The Hong Kong Academy for Performing Arts, 2006.
- Opper, Sylvia, "Comparison of certain structural and organisational features of Hong Kong kindergartens and nurseries",
<http://sunzi.lib.hku.hk/hkjo/view/36/3600007.pdf>
- Pearson, Emma and Nirmala Rao,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policy reform in Hong Kong: challenges in effecting change in practices", Cnet Networks,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qa3614/is_200601/ai_n17174789
- Reuter, James B. *For the young at heart: highlights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Manila. 1965.

- Ryan, Thomas F. *The story of a hundred years.* Hong Kong: Catholic Truth Society, 1959.
- Santinon, Narciso. "30 years." *Hong Kong Paulinian Newsletter*, No. 143, June 1992.
- Santos, Josefina. "An interview." *Hong Kong Paulinian Newsletter*, No. 139, October 1991.
- Santos, Josefina. "MBE honour." *Hong Kong Paulinian Newsletter*, No 182, February 1997.
-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Hong Kong: 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 Chateaudun: Societe Francaise de Phototypie, 1910.
-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From the notes of Louis David). *Hist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trans. 1986.
- Smith, Carl T. *A sense of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Ticozzi, Sergio.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Hong Kong Catholic Church.* Hong Kong: Hong Kong Catholic Diocesan Archives, 1997.
- Vaudon, Jea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community of the Sisters of St Paul of Chartres*, trans. Hong Kong: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1979.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譯名表

人名

修女

Marie Anne de Tilly	迪瑪利·安娜	
Marie Micheau	瑪麗·米素	
Mother Anne-Marie Audet	奧安瑪利	總會長
Mother Bernard de Marie de Broqueville	納德·貝克維	會長
Mother Felicie Jourdan	菲力斯·佐頓	姆姆
Mother Lucie Ko	高慧儀	會長
Mother Marguerite de St Paul Nuss	瑪加利·聖保祿·盧斯	姆姆
Mother Marie Isabelle Tchang	張佩瓊	會長
Mother Paul de la Croix Biard	保祿·十字·庇雅	姆姆
Mother Pauline Figus	保蓮·費格	姆姆
Mother St Xavier Vermeersch	聖沙勿略·維美斯	姆姆
Sr Alphonsine Forcade	雅芳善·科嘉	修女
Sr Anna	安娜	修女
Sr Auguste Gallois	奧古斯·嘉萊	修女
Sr Beatrice Roberts	庇雅斯·羅柏	修女
Sr Benjamin Dei	戴本雅明	修女
Sr Benjamin le Noel de Groussy	本雅明·諾爾·古斯	修女
Sr Carmela Santos	賈美蓮	修女
Sr Eva Fidela Maamo	萬依華	修女
Sr Gabrielle Joubin	佳播·祖賓	修女
Sr Helena Noronha	羅海倫	修女
Sr Isabel of the Angels Narciso	迺依撒伯爾·天神	修女
Sr Josefina Santos	申頌詩	修女
Sr Louise Morse	雷絲·莫斯	修女
Sr Margaret Wong	黃金蓮	修女
Sr Marie Auguste Roue	魯瑪利·奧古斯	修女
Sr Marie du Sacre Coeur Gil	姬瑪利·聖心	修女
Sr Marie Noel Aranda	艾蘭德	修女
Sr Marie Pauline Wong	王德蘭	修女
Sr Rita	麗達	修女
Sr Rosalie Chan	陳順金	修女
Sr Rose Mary Clifford	祁玫瑰·瑪利	修女
Sr St Jean	聖若望	修女
Sr Stanislaus Leung	梁志修	修女
Sr Ste Marcelle	聖瑪素	修女

神 職

Bishop	Bianchi	白英奇	主教
Bishop	Charles de Forbin Janson	嘉祿·霍賓·鄭信	主教
Bishop	Dominico Pozzoni	師多敏	主教
Bishop	Enrico Valtorta	恩理覺	主教
Bishop	John Baptist Wu	胡振中	主教
Bishop	John Tong Hon	湯漢	主教
Bishop	Joseph Zen	陳日君	主教
Bishop	Raimondi	高	主教
Cardinal	Barnabo	巴拿甫	樞機主教
Fr	Andrew Granelli	顏思回	神父
Fr	Emile Louis-Tisserand	呂德能	神父
Fr	Feliciani Marine	裴	神父
Fr	George Byrne	佐治·博爾	神父
Fr	Gerard Hugh Casey	祁祖堯	神父
Fr	John Pittavino	容達榮	神父
Fr	L Vircondelet	衛	神父
Fr	Leon Robert	金	神父
Fr	Louis Chauvet	沙路易	神父
Fr	Luigi Ambrosi	盎	神父
Fr	Narciso Santinon	桑得嵐	神父
Fr	Patrick J Joy	蔡伯德	神父
Fr	Robert W Gallagher	嘉利華	神父
Mgr	Adolphe Rayssac	實茂芳	主教
Mgr	Francis Xavier Ford	福爾德	主教
Mgr	Francois-Lazare Sequin	施恩	主教
Mgr	Gustave-Joseph Deswaziere	祝福	主教
Mgr	Jean-Baptiste Penicaud	賚	主教
Mgr	Louis-Eugene Regnault	類思·尤真·雷諾	主教
Mgr	Luigi Piazzoli	和	主教
Mgr	Paul Godet des Marais	保祿·葛德·馬列	主教
Mgr	Theodore Augustine Forcade	狄奧多·奧斯定·科嘉	主教

其 他 人 士

Ann Hui	許鞍華	女士
Anna Chan	陳香梅	
Baroness Lydia Dunn	鄧蓮如	男爵
Chief Executive Tung Chee Wah	董建華	香港特首
Chief Secretary Anson Chan	陳方安生	政務司長

Deng Xiaoping	鄧小平	
Dr Bernardo de Sousa	蘇納德	醫生
Dr Christina Chow	周寶煌	醫生
Dr Karl Justi	加爾·猶迪	醫生
Dr Oskar Muller	奧斯加·梅利	醫生
Emmanuel Ralph Belilios	厄瑪奴爾·拉法·庇理羅士	
General Claire Lee Chennault	陳納德	將軍
Governor Christopher Patten	彭定康	港督
Hon Charles Edward Anton	查理士·愛德華·晏頓	議員
Hon David Landale	達味·蘭杜	議員
King Louis XIV	路易十四	法皇
Lady Helena May	梅海倫娜	夫人
Lady MacLehose	麥理浩	夫人
Mother Auxiliatrix	奧斯利	姆姆
Mr Barton	巴頓	先生
Mr Chanatong	陳納堂	先生
Mr Figueiredo	費嘉度	先生
Mrs Betty Tung	董趙洪聘	特首夫人
Mrs Goddard	葛達	太太
Mrs Diana Wong	黃葉慧瑩	女士
Mrs Lavender Patten	彭定康	夫人
Mui Tsai	妹仔	
President Kennedy	甘迺迪	總統
President Reagan	列根	總統
Prof Sir Harry Fang	方心讓	爵士
Sir Francis Henry May	梅軒利	爵士
Sir Frederick Lugard	弗德烈·盧押	爵士
Sir Henry Arthur Blake	亨利·亞瑟·卜力	爵士
Sir Paul Chater	保祿·遮打	爵士
Sir Matthew Nathan	瑪竇·彌敦	爵士
Sir Murray MacLehose	麥理浩	爵士
St Paul	聖保祿	
St Therese of Lisieux	聖德蘭·里修（小德肋撒）	
St Vincent de Paul	聖文生·德保	
Vacher	華西	

修會機構名稱

Almshouse	仁濟之所
Anglo-French School	英法學校
Asile de la Sainte Enfance	聖童之家
Association of Holy Childhood	
Holy Childhood	
Home of the Holy Childhood	
Refuge of the Holy Childhood	
Aurora College	震旦書院
Australian International Section	澳洲國際書院部
Casa San Jose	聖若瑟會院
Catholic Mission	天主堂
Christ the King Chapel	基督君王堂
City of Charity	仁愛小城
City of Refuge	庇護之城
Crèche / nursery	育嬰院
Daughters of the School of Levesville	樂維威學校的女兒
French Convent Hostel	法國修院宿舍
French Convent School	聖保祿學校
French Hospital	法國醫院
Friends of St Paul	聖保祿之友
Hong Kong University	香港大學
House of Happiness	喜樂之家
International Section	國際書院部
Le Calvaire	加爾瓦略山
Lovers of the Cross	十字架的愛護者
Our Lady's Hall	聖母宿舍
Ouvroir Ste Jeanne d'Arc	聖貞德工藝室
Pavillion Notre Dame	聖母產科醫院
Sisters of St. Paul de Chartres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 修女
St Joseph Girls' School	聖約瑟女子學校
St Margaret's Evening School	聖瑪加利大夜校
St Marguerite's Vernacular School	聖瑪加利漢文學校
St Paul's Catholic Day Nursery	天主教聖保祿日間托兒所
	天主教聖保祿幼兒園
St Paul's Convent	聖保祿修院
St Paul's Convent School	聖保祿學校
St Paul's Home for Girls	聖保祿女子宿舍
St Paul's Hospital	聖保祿醫院

St Paul's Institution	聖保祿機構
St Paul's Kindergarten	聖保祿幼稚園
St Paul's Novitiate	聖保祿初學院
St Paul's Orphanage	聖保祿育嬰院
St Paul's Orphanage and Creche	聖保祿孤兒及育嬰院
St Paul's Primary Catholic School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St Paul's Refuge	聖保祿庇護所
St Paul's School (Lam Tin)	藍田聖保祿中學
St Paul's Secondary School	聖保祿中學
St Teresa's Church	聖德肋撒堂
St Teresa's Hospital	聖德肋撒醫院
St Teresa's Nursing Home	聖德肋撒育嬰院
Star of the Sea Clinic	海星診所
Stella Maris Catechumenate and Dispensary	海星教理室及診所

教區牧銜

Hong Kong Prefecture	香港監牧區
Papal Nuncio to China	教廷駐華大使
Prefect Apostolic	宗座監牧
Prefect of Propaganda	傳信部總監
Pro-Prefect Apostolic	宗座代監牧
Vicar Apostolic	宗座代牧
Vicar Apostolic of Kweyang	貴陽宗座代牧
Vicar Apostolic of Swatow	汕頭宗座代牧

天主教機構名稱

American Assumption Sisters	美國聖母升天女修會
Bethanie House	伯大尼會院
Cambridge University	英國劍橋大學考試局
Board of Examinations	
Canonesses of St Augustine	聖奧斯定嘉諾撒修女
Canossian Sisters	嘉諾撒修會
Caritas Hong Kong	香港明愛機構
Catholic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America, Inc. (Maryknoll Fathers)	美國天主教傳教會 (瑪利諾神父)
MM	

Children of Mary	聖母孝女會
Communist	共產黨
Daughters of Charity	仁愛女修會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of Mary	瑪利亞方濟各傳教修會
Good Shepherd	善牧會
Immaculate Heart of Mary Church	聖母無玷之心堂
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GCSE	國際中學文憑課程
Legion of Mary	聖母軍
Little Sisters of the Poor	安貧小姊妹會
Lombardi Clinic	隆巴迪診所
Nationalists	國民黨
Nazareth House / Press	納匝肋會院 / 印刷館
Our Lady of the Angels	天神母后修會
Our Lady of the Rosary Parish	聖母玫瑰堂
Pontifical Foreign Missions Institute PIME	宗座外方傳教會
Pope John XXIII Clinic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診所
Ricci Hall	利瑪竇宿舍
Sacred Heart of Mary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Second Vatican Council	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
Society of the Foreign Missions of Paris MEP	巴黎外方傳教會
Society of Jesus	耶穌會
St Charles School	聖嘉祿學校
St Joseph's School	聖若瑟學校
St Lawrence Church	聖老楞佐堂
St Margaret's Church	聖瑪加利大堂
St Michael's Cemetery	聖彌額爾墳場

其他名稱

Belilios Reformatory	庇理羅士感化院
Cambridge University Board of Examinations	英國劍橋大學考試局
Children Reception Centre	兒童接待所
Civil Defense Office	自衛隊辦公廳
Civil Japanese Department	日本民政部
Coifs	頭巾
Communist	共產黨

Cornette	帽子
Cultural Revolution	文化大革命
Economic Awakening of Indo-China	印度支那經濟復甦
Education Commission	教育統籌委員會
Education Department	教育署
Executive Council	行政局
Gestetner	佳士得耶公司
Healing and Care into the Next Millenium	邁進新千禧後的治療及護理
Hong Kong Cotton-Spinning, Weaving and Dyeing Company	香港棉紡織染公司
Hong Kong Land Company	香港置地公司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香港學校音樂節
Hong Kong University	香港大學
IBM	國際商業機器公司
International 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 IGCSE	國際中學文憑課程
ITA, Initial Teaching Alphabet	初級字母教授
Japanese Medical Department	日本衛生部
Jardine, Matheson & Co	英商渣甸洋行
Kai Tak Airport	啟德機場
Kowloon Hospital	九龍醫院
Kowloon Residents Association	九龍居民聯誼會
Legislative Council	立法局
Magsaysay Award	麥西西獎
Most Excellent 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大英帝國最優秀勳章
Nationalists	國民黨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一國兩制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
Pok Oi Hospital	博愛醫院
Queen Mary Hospital	瑪麗醫院
Senior Unofficial Member	首席非官守議員
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	中英聯合聲明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社會福利署
Sookunpoo Military Training Field	掃桿埔軍事訓練營
Stanley	赤柱
Texaco	德士古
The Education of Anna	《香梅的教育》
The Role of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in Health Care	修道團體在醫療服務的角色

Tung Wah Hospital
US Republican
Waterloo Road

東華醫院
美國共和黨
窩打老道

地名

Alsace
Anglican
Annam
Anton Street
Balkans
Caroline Hill
Cayenne
Chartres
Cochinchina
Chuk Yuen
Eyre Diocesan Refuge
French Guiana
Fuzhou
Guadeloupe
Haifeng
Hainan Island
Happy Valley
Kaying-Chow -- Meixian
Kunming
Kwong Fuk Road
Lam Tin
Landale Street
Laos
Levesville La Chenard
Li Cheng Uk
Lomond Road
Macau
Marine Lots 23 and 24
Moss Vale
Pakhoi
Philippines Islands
Po Shan Road
Praya East

亞撒爾
聖公會
安南
晏頓街
巴爾幹
加路連山
嘉應
沙爾德
交趾支那
竹園
愛爾教區庇護所
法屬圭亞那
福州
瓜德羅普
海豐
海南島
跑馬地
嘉應州 -- 梅縣
昆明
廣福道
藍田
蘭杜街
寮國
樂維威村·迺桑里
李鄭屋邨
露明道
澳門
二十三及二十四地段
摩士圍
北海
菲律賓群島
寶珊道
海旁東

Prince Edward Road	太子道
Queen's Road East	皇后大道東
Saigon	西貢
Samos	薩摩士
Siam	暹羅
Strasbourg	薩士堡
Taipo Market	大埔墟
Tonkin	東京
Victoria City	維多利亞市
Wanchai	灣仔
Wong Nai Chung Road	黃泥涌道
Wong Tai Sin	黃大仙
Yunnan Province	雲南省